****

**硕士学位论文**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启动阶段的“安全信任”因素考察：基于欧洲两个一体化组织的实证研究**

****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ongji Universit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Law

**Researching on the Role of Security Trust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Two Similar Cases in Europe**

March 2017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同济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同济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摘要**

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以来，西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在经济领域的一体化，正处于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发展新阶段。“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通过让渡自己的主权，建立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超国家机构，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与“欧洲共同体”一体化发展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成立主要由东欧国家组成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则面临着发展停滞的困境，并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崩溃。为什么在同样时代背景下的两个一体化组织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文章拟提出一个核心假设，即区域一体化初期阶段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建立，对区域一体化合作未来的深入推进至关重要。当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得到成功构建后，一体化组织会产生三个结果：1）“安全信任”关系建立之后，成员国国政府和国内社会公众会支持本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一体化合作；2）“安全信任”关系建立之后，各成员国会更容易在“高级政治”领域开展合作；3）“安全信任”关系建立之后，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会朝着更加高密度，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文章通过对几乎同时期的两个欧洲一体化组织，“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进行实证考察，通过相异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上述假设和理论预测进行检验。文章认为，“欧洲共同体”从初期启动阶段之后能够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原因就在于，“欧洲共同体”最初的成员国之间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反之“经济互助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公家联合，没有建立稳固的国家间信任关系，最终走向灭亡。

最后，文章为普遍的一体化组织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欧洲共同体，经济互助委员会，安全

**目录**

第一章 导言1

1.1 问题的源起2

1.2 研究综述2

1.2.1 国内外在该研究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动态3

1.2.2 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3

1.3 研究方法及文章框架2

1.3.1 研究方法3

1.3.2 文章篇章安排3

1.3.3 本课题研究问题及其工作范围3

第二章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一项相异案例的比较研究4

2.1 作为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异案例研究5

2.2 “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发展及其历史背景5

2.2.1 “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及其历史背景6

2.2.2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发展及其历史背景6

2.3 “欧洲共同体”的推进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失败：对成员国性质的讨论5

2.3.1 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及贸易联系6

2.3.2 成员国的宗教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6

2.4 本章小结2

第三章 “安全信任”因素与区域一体化初期阶段4

3.1 区域一体化及其发展阶段5

3.2 “安全信任”关系及其来源5

3.3 “安全信任”关系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关键维度5

3.3.1 媒体、民众与政府6

3.3.2 “高级政治”合作6

3.3.3 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交往6

3.4 文章的预测性假设2

第四章 “欧洲共同体”的推进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失败：基于“安全信任”因素的解释4

4.1 作为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异案例研究5

4.2 “欧洲共同体”成立前后（1950-1992）5

4.2.1 “欧洲共同体”取得成功的先天条件6

4.2.2 “欧洲共同体”的成功推进6

4.2.3 总结6

4.3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前后（1949-1991）5

4.3.1 “经济互助委员会”失败的先天条件6

4.3.2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崩溃6

4.3.3 总结6

第五章 结论：“高级政治”为导向的区域一体化实践61

致谢4

参考文献4

附录A “欧共体”与“经互会”各成员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

附录B “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额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百分比4

附录C Freedom House年度人权报告（1980）4

附录D “欧共体”与“经互会”成员国的宗教信仰分布情况4

附录E “欧共体”与“经互会”成员国4

个人简介4

“在共同体内部，成员国制定了一个拥有周详的制度、义务和程序的体系，并不断发展这个体系，使它能够确保大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不会以牺牲小成员国的利益为代价。”**[[1]](#footnote-1)**

**--------- 克里斯托弗 图根哈特**

“我们应当记住，斯大林强加给西伦凯维兹的不平等贸易条约，已经促使波兰成为一个心怀怨恨的邻国，而且几乎引起了一场政治爆炸。”**[[2]](#footnote-2)**

**--------- 赫鲁晓夫**

**第一章 导言**

**1.1 问题的源起**

欧洲的一体化思想由来已久，这一思想伴随着欧洲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得以凸显，原本分散的欧洲民族国家开始让渡自己的部分主权，逐渐组成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民族国家聚合体。欧洲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并逐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政治理论不得不对这一发展趋势做出回应，“区域一体化理论”应运而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研究不仅会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欧盟内外政策提供帮助，还会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区域一体化理论，从而为理解世界上其他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借鉴。

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生命周期，这个“生命周期”包括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启动阶段”，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外溢阶段”，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即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失败”或者“进一步推进”。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时发现，以往对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区域一体化是如何逐步得到推进的。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阶段”和“外溢阶段”；还有少部分文献还关注于“区域一体化失败”或“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性问题。这类研究无一例外的都是将区域一体化进程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即假设区域一体化已经得到了建立，而很少涉及区域一体化进程“启动阶段”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果将“区域一体化”看作为区域整合的一个生命周期的话，那么对区域一体化最初形成阶段的考察就显得至关重要。尽管也有一些文献涉及到区域一体化的最初形成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能让人满意。如果要考察区域一体化最初的形成，就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关于区域一体化历史的叙述和理解。

在本课题中，笔者将试图回答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欧洲共同体”和“经

济互助委员会”，为什么“欧共体”成功了而“经互会”却失败了？在区域一体化启动阶段，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一体化组织未来的发展？为什么只有“欧共体”超越了区域自由贸易联盟这样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一体化？

文章发现，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启动阶段”过程中，成员国建立相互的“安全信任”的程度，对于区域一体化组织后续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欧共体”和“经互会”之所以在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迈向了不同的道路，主要原因是“欧共体”在建立初期，成员国就形成了相互信任的安全关系，而“经互会”在建立初期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于成员国之间无法形成高水平的互动和交流，最终建立在薄弱基础上的一体化机构只能走向瓦解。

**1.2. 研究综述**

一体化理论的出现是国际政治学理论对于20世纪中后期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回应，这一理论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Haas认为所谓一体化是指，在特定国家集合中的政治行为体，将他们的忠诚、期望以及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新的超国家机构的过程[[3]](#footnote-3)。而其中，经济一体化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一体化形式。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很少有经济一体化组织经过发展而成为超越经济合作范畴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组织往往难以从经济合作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政治合作。“欧洲共同体”是一个特例。“欧共体”在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不仅实现了超越经济合作范畴的高度一体化，并且在1993年将“欧共体”整合为一个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EU)”，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然而，同样是在欧洲，由前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最初也是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而存在，但是却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经济互助委员会”不仅没能推动“经济互助委员会”由经济一体化的专门组织向着超越经济合作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迈进，而且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过程中作用也相当有限。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互助委员会”也随之走向崩溃。

作为两个高度相似的一体化组织，为什么是“欧洲共同体”实现了超越经济合作的更高层次一体化？而“经济互助委员会”却没有实现所谓的“功能性外溢”而发展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体化组织？

**1.2.1 国内外在该研究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国内外学者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多以国外学者为主。

“沟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伊奇（Deutsch）是最早开始对一体化产生的条件进行研究的学者。多伊奇在研究“北大西洋共同体”时发现，共同体的发展与形成主要有两类情况：1、为了防止组织内部的某些成员国实力过于膨胀，从而对一体化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组织内的成员国通常会在成员国内部形成某种力量均势，这种力量的均势实现了成员国的相互妥协。2、Deutsch也发现在一些案例实践中，组织内部并不存在这种实力的均势，更多情况下，一个强大的力量中心也许对于一体化的延续（或存在）更为重要。这个中心能够为其组成单位提供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定传统和制度的学习榜样。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培养的过程[[4]](#footnote-4)。在多伊奇看来，这两种模式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得以深入推进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多伊奇还认为成员国之间一体化主体价值的互适性和相互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成员国希望改变原有关系现状的强烈愿望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入推进的重要原因。根据“沟通学派”理论的推理，“欧共体”成功推进了一体化进程，是因为在“欧共体”内部形成了一个相互学习的共同体意识；而“经互会”一体化努力的失败，则表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并没有建立所谓的“共同体意识”。

1968年哈斯（Haas）和施密特（Schmitter）通过对拉丁美洲自贸区进行研究，发现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体化现象：第一，背景条件。包括加入经济联盟组织成员国的国土面积、综合实力、军事实力、国内的多元主义影响力、成员国之间交流的频率，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精英之间的互补性等；第二，一体化进入“经济联盟”阶段时的条件。主要包括可能的政府计划以及新的区域机制的权力和功能两个方面；第三，机制过程方面的条件。主要包括决策风格、交易的增长率、政府和私人行为体的适应能力等。通过对十个一体化组织进行实证考察后他发现，只有“欧洲经济共同体”才能最终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5]](#footnote-5)。

哈斯总结了欧洲一体化实践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超国家的机构必须应当与成员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基础相适应；第二，成员国要有相对比较发达的工业和经济；第三，成员国要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只有满足了上述条件，一体化进程才能取得进展[[6]](#footnote-6)。据此，哈斯认为，欧洲的一体化将会比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开展得更加顺利。

奈（Nye）进一步发展了一体化的背景条件的概念，他认为要成功使得一体化推进，就必须要区分“结构条件”（Structural Condition）和“认知条件”（Perceptual Condition）这两个概念。“结构条件”主要包括，一体化计划的组成单位之间的匀称程度和适应程度、成员国的反应和调适能力、成员国多元主义的程度，以及精英在经济政策价值上的互补程度等。“认知条件”是指对一体化收益分配是否平等的认知；行为体对他们外部环境的认知；以及一体化成本是否低，且可以向外部转移的认知[[7]](#footnote-7)。此外，奈也指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偶然历史因素的作用。

“新功能主义”修正了“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认为一体化本身并不能得到主权国家的支持，一体化进程实际上是成员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做出理性选择的结果。“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哈斯认为，一体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外溢”的效果。“外溢”可能会使一体化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朝着一体化不利的方向发展。“外溢”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各行为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哈斯认为，“外溢”是行为体自觉的过程，当各行为体在切身利益上产生共同认识之后，会将某一领域内的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外溢”现象才有可能发生。由此可见，哈斯认为成员国对于一体化可能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随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新功能主义”的解释力出现下降，“政府间主义”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政府间主义”认为，成员国的偏好以及政府间的权力交易在一体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一体化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也试图从“政府间主义”的视角来理解一体化的条件问题。

莫劳夫奇克提出“自由政府间主义”的一体化理论。在《欧洲的抉择》一书中，莫劳夫奇克认为，成员国会因为经济上的利益而推进区域一体化。莫劳夫奇克通过将各国政府的一体化动机分为“地缘政治利益和观念”和“经济利益”两大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地缘政治利益和观念”确实在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仍是主要原因。因而，欧洲一体化是各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8]](#footnote-8)。

很多学者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欧洲成员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欧洲身份”上，他们认为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认同，在民主化运动开展之后，很多欧洲国家又同时有着相同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认同。正是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认同，才形成了成员国之间超越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例如，巴哈（Behr）在*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Legacies of Imperial Rule? EU Accession Politics Viewed from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一文中认为，欧洲的联合应当从欧洲的历史中寻求灵感。欧洲一体化的观念来自于19世纪的欧洲，这种欧洲国家的“文明的标准”将欧洲国家政治经济的联合当作为欧洲联合的普遍规范。陈乐民在《“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欧洲观念”的历史形成源远流长，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古希腊。在随后的中世纪基督文明期间，欧洲大陆更是由之前形成的“无意识欧洲观念”发展成为“有意识的欧洲观念”，到了近代和现当代，“欧洲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当一场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国际战争结束之时，民族主义就遭受到了抨击，民族国家面临挑战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股推动欧洲联合的大潮流。张旭鹏在《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一文中认为，欧洲的“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推进的基础。当今的欧洲一体化总体上来说还只是一个精英领导的运动，欧洲的文化认同缺失则有可能对欧洲一体化造成损害。欧洲要想继续推进文化认同就必须建构和寻求新的欧洲文化认同。

还有不少研究认为，成员国中的民众的支持与否是欧洲一体化能否向前继续推进的关键。1973年开始，欧洲委员会开展一系列的欧洲民众公共舆论的社会调查，调查结果以“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形式对外公开发布。欧洲委员会希望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欧洲民众对某些特殊问题的态度调查，实现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质量的评估。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委员会将欧洲公众对于特定问题的态度当作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条件，即公众的支持是欧洲实现高度一体化的原因。爱因伯格（Eichenberg）和达尔顿（Dalton）在*European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dynamics of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一文中认为，公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显得越来越重要，作者通过使用欧洲委员会发布在1973到1988年的“欧洲晴雨表”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公众对于欧洲一体化态度主要是受内外部因素相结合的影响。这些因素会对公众对一体化的态度产生影响，因此内外部因素影响下的公众态度对于欧洲一体化能否继续向前推进影响巨大。戈贝尔（Gbel）在*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ass Politics: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in the European Union*一文中，也使用“欧洲晴雨表”以及1975年到1992年OECD的相关经济统计数据，检验了欧洲联盟成员国不同职业群体对于国际经济政策的态度，他认为不同职业群体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收益多少，是决定成员国如何加入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可见他们都是将“公众态度”当成欧洲一体化能否持续推进的重要变量。

还有学者从关键成员国的参与角度来分析欧洲一体化得以往前推进的条件。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实际上要不是成员国中的几个影响力大的国家的一体化，要不就是区域之外其他若干大国支持的产物。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韦伯（Webber）在*The France-German Relation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一书中认为，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的角色，从而有效平衡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得失，并监督成员国履行各自的责任。所以，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帕特森（Pedersen）也持有类似观点，在*Germany, France and Integration of Europe A Realist Interpretation*一书中，他认为法国和德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动机”，法德之间的和解是欧洲早期一体化得以推进的重要前提。伍贻康在《法德轴心与欧洲一体化》一文中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之初，法国和德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法国和德国的和解，就不可能有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当前的“法德轴心”的重要性虽不及以前，但是仍然是欧洲一体化的“主心骨”和“顶梁柱”。郭振家在《美国的介入和亚洲一体化：基于欧盟创立及发展历程的反思》一文中，回顾了“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得以推进的条件，除了成员国共同的安全诉求、核心大国的协商一致，以及相似的社会基础等内在条件之外，美国支持作为重要的外部条件，也为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

**1.2.2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用“欧洲统一文化”以及所谓的“欧洲身份”来解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内生因素，但是仍缺乏足够可靠的经验证据支撑。首先，“文化”及“身份”的概念太过于宽泛，用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去解释现象，在为现象提供了良好的说服力的同时，却出现了无法对理论进行“证伪”的困境。“文化”理论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样本，这也是笔者认为这类理论最大的困境之一。其次，这种倾向于“欧洲联合”的“欧洲文化”和“欧洲身份”实际上是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如果“欧洲身份”确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自变量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个常量。但事实上，所谓“欧洲身份”一直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每当欧盟（“欧共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成员国总是能形成紧密的“欧洲认同”，反之“欧洲认同”也将不复存在。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后所指出的那样：“欧元的崩溃，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的崩溃，更是欧洲和‘欧洲统一意识’的崩溃。”可见，“欧洲统一文化”和“欧洲身份”并不是解释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变量，至少不是唯一变量，在其背后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用公众的态度来研究欧洲一体化同样也会带来困境。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启动阶段，实际上是一种由各国政治精英推动的，民众并没有广泛参与一体化未来设计的相关讨论。例如，邢瑞磊在《欧洲一体化公众支持行为分析》一文中指出，“舒曼计划”几乎就是由法国和德国的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在以接近“秘密外交”的形式下完成的。事实上，即便是爱因伯格（Eichenberg）和达尔顿（Dalton）认为内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民众态度会对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他们也仅仅承认SEA（“欧洲单一市场”）这些欧洲一体化发展成熟阶段进程中，欧洲民众态度的影响。而并未提及“民众态度”在“欧共体”一体化早期阶段的影响。因此，基于民众态度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欧洲一体化最初的动因，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欧洲共同体”最终形成了超越经济合作的更加广泛的一体化。民意或者公众态度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可能仅仅是影响因素，但是不是主要变量。

从区域内的关键国家的角度分析欧洲早期一体化的动因，同样无法让人满意。作为与“欧洲共同体”几乎同一时期产生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它的成立背景与“欧洲共同体”很相似。在“经互会”成立的初期，苏联作为东欧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扮演着一体化发动机的角色。尽管“经互会”宣称要最终实现高度的一体化，但实际上“经互会”只停留在有限的经济合作范畴之内。因此，区域内关键国家的推动，可能并非是一体化组织能够继续推进的原因。

还有一些研究，虽然指出了法国与德国在“欧共体”早期的合作，对“欧共体”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指出早期法德合作对于未来“欧共体”发展所起到的具体作用，特别是没有指出“欧共体”早期在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上既是以往研究的主要缺陷，也是本课题所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1.3 研究方法及文章框架**

**1.3.1 研究方法**

文章将遵循埃弗拉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路径，首先提出文章的核心假设，再通过两个极端值案例进行相异案例的比较，证实或证伪文章的核心假设。具体来讲，笔者将首先建立文章的核心假设，再根据文章的核心假设对可能由该假设所产生的事件进行逻辑预测，如果逻辑预测的结果与上述假设一致，那么该假设将会可能得到验证，反之该假设被证伪。

**1.3.2 文章篇章安排**

本课题拟分为三部分。在课题的第一章，笔者将主要介绍“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典型且具有很强代表性的一体化组织成立的历史背景，从而指出“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两个一体化组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具备横向和纵向比较的可能性。通过对两个一体化组织横向和纵向上的比较，文章指出学术界的两个流行的一体化组织发展的解释并不能让人满意。在第二章，笔者将讨论作为实证科学的相异案例研究方法，并指出“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诸多变量上具有相似性，具备进行横向和纵向进行比较的基础。通过控制变量之后，文章指出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构建是影响一体化组织的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在第三章，文章将具体论述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是如何影响一体化组织未来的发展的，并且提出三个由“安全信任”关系构建而导致的三种可以观测到的现象。在第四章，文章将会重新回顾“欧洲共同体”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一体化组织，对文章的核心假设进行重新检验。第四章是结论，并提出了关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1.3.3 本课题研究的问题及工作范围**

本课题主要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一些区域一体化组织成功了（继续深入推进），而另外一些区域一体化组织没能得以继续推进？影响一体化组织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一体化特别是欧洲一体化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被进一步研究，但由于文章的需要以及课题的最终研究目标，笔者将不会对以下内容进行论述。

首先，笔者不打算在该课题中讨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产生问题。区域一体化组织的产生，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甚至地理的解释，文章不打算对这些特殊现象进行解释，甚至提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文章需要解决问题的重点是当区域一体化组织形成之后，它是如何继续推进的。

其次，文章本文不打算对区域一体化组织何时会消失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虽然笔者认为“启动阶段的安全信任因素”对一体化组织后期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启动阶段的安全信任因素”的构建是区域一体化组织永远存在的保证。

最为重要的是，本课题不打算对欧盟现阶段因为“不信任”因素而导致的一体化受挫这一现实进行讨论。而且笔者也认为欧盟当今的政治发展现实也不会对本课题的假设构成挑战。

**第二章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一项相异案例的比较研究**

“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在欧洲成立的两个重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这两个组织无论是在成立的时间、国际格局的背景，以及地理的区位上都很相似，两个组织的成员国之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然而两个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路径却截然不同。“经济互助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事实上走向了衰落[[9]](#footnote-9)，到了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一一体化组织也随之崩溃。但是“欧洲共同体”却经过不断的发展，不仅在“低级政治”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广泛的合作，而且还在统一货币体系和财政政策；共同的边境及出入境管控；以及外交和军事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转变为“欧洲联盟”。笔者认为，两个一体化组织的之所以出现了不同命运，并非是由于两个组织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的不同，也不是因为两个一体化组织内部成员国“同质性”程度的差异[[10]](#footnote-10)。

**2.1 作为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相异案例研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案例研究是探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果关系”是指，当因变量有不同的取值时，案例之间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异[[11]](#footnote-11)。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实验是最为可靠的确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试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通过控制“自变量”（也称“解释变量”）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实验中，通过区分“实验组”（treatment group）和“参照组”（又称“控制组”）（control group），然后对所有“自变量”进行随机选择和赋值，来观察“自变量”的选择和赋值对于“因变量”结果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科学很难找到精确的“实验组”和“参照组”，因而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的方式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统计学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另外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般要求以大样本数据为研究基础，这种大样本定量研究的研究推理逻辑是“对‘自变量’的控制和单元的随机选择与赋值，从而确保了因果联系（如果存在）的系统性。[[12]](#footnote-12)”但是统计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统计学的频度统计还是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它们仅仅能提供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不能很好地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缺少足够多的研究样本，在这时研究者往往会通过主观选择案例的方式，再现案例发展流程进行个案研究，试图发现案例中的所谓“单元的同质性”，进而做出相对可靠的因果关系推理[[13]](#footnote-13)。

案例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中的最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作为定性研究方法中的案例研究方法，其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最大程度上描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同时还能够通过案例的流程再现的方式还原整个事件发生的逻辑。但是最为定性研究的案例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定性研究方法众所周知的缺陷。一个对案例研究最为常见的批评就是，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可能会存在一些系统性的偏见，从而会对研究的案例进行有意识的挑选，使案例符合自己的期望。主观选择研究案例，并对案例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研究的可信度，也不利于案例研究方法的推广。

为了回应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广泛质疑，最大限度地模拟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变量控制技术，“比较案例”（controlled comparison）的案例设计方法被提出[[14]](#footnote-14)。“比较案例”研究是将两个或多个相似的案例放在一起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案例中变量的控制。根据约翰密尔（John Mill）最早提出了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在《逻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确定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即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其中，求同法和求异法是两种最为常见和最为主要的确定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15]](#footnote-15)。求同法是通过对比相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从而确定相同的自变量导致了相同的因变量。而求异法是通过在两个或多个不同因变量的案例中，寻找不同自变量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求异法可以模拟“参照组”和“实验组”，从而使得案例研究能更加接近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作为求异法的“相异案例”研究对于“个案研究”来说，研究的目的并非是追溯案例的发展过程，而是通过实现对研究变量进行控制的方式，最终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Charles Ragin认为，“相异案例”研究的一般过程首先是利用现有的经验和知识区分案例之间的相关差异；其次是探讨这种差异与案例不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在识别案例间差异的基础之上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一般性的解释[[16]](#footnote-16)。本课题也将按照这一路径进行。

如前所述，“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两个一体化组织在诸多自变量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控制两个案例中的自变量的方式，观察不同的因变量，实现对造成两个典型一体化组织不同结果的原因的最终确定，实现对文章假设的验证。

就特征而言，“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都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具体来说，“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在成立的国际背景；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有着比较大的相似性[[17]](#footnote-17)。因此具备了将这两个一体化组织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可能。笔者将着重对两个一体化组织成立的国际背景进行比较，同时也对成员国之间的“同质性”进行比较，基于上述比较笔者将提出文章的假设。

**2.2 “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发展及其历史背景**

“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都是在相同的国际背景下成立的。“欧洲共同体”在二战结束之后，由西欧六个国家发起，在几个专业性国际协调机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涵盖西欧大部分国家的综合性一体化组织。“欧共体”的早期发展，不仅为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大陆带来了和平，同时也使得西欧成为了战后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18]](#footnote-18)。几乎在同一时期，苏联和罗马尼亚发起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设想，其目的最初是试图缓解由美国“马歇尔计划”给“苏联集团”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19]](#footnote-19)。通过社会主义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经济互助委员会”最终也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一体化。可见，两个一体化组织都是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的新的国际局势背景下成立的。

**2.2.1 “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及其历史背景**

“统一欧洲”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古罗马时期，就有人试图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是“统一欧洲”在近代最早的思想起源来自于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说。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演讲中称“只有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Europe)’，才有可能够维持欧洲的和平”，他呼吁整个欧洲国家和人民都要致力于永远消灭“欧洲的民族主义顽疾和战争狂人”[[20]](#footnote-20)。1948年，来自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代表参加了“海牙会议”。“海牙会议”会议讨论了在保存各个国家主权与地区和平的前提下，建立欧洲各国合作的可能性。“海牙会议”以后，“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宣告成立，但是这个机构仍属于低层次国际合作的尝试，并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超国家一体化机构。随着冷战的逐步升级，更多的西欧合作机制得到了充分发展。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签订，西欧各国开始在军事领域上进行合作；同年，推动欧洲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也宣告成立。1950年，在莫内的建议下，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舒曼提出建立一个“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的设想。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六个西欧国家在巴黎签订条约，宣告“欧洲共同体”的早期原型——“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ECSC)成立[[21]](#footnote-21)。在1955年的墨西拿会议上，西欧六国决定将六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从煤炭、钢铁领域拓展到其他经济部门。1957年六国签订了《罗马条约》，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A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使欧洲朝着更高程度的一体化进程迈进。1958年到1966年，虽然这一阶段发生著名的“空椅子危机”，使得一体化进程发展受阻，但是西欧一体化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依旧非常迅速。1962年《欧洲农业共同政策条约》生效；“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也先后宣告成立；此外，“欧洲议会”以及“欧洲法院”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建立。在经过了“政府间主义”的停滞时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在1974年到1986年间得以快速推进[[22]](#footnote-22)。1974年，根据《达维农报告》精神，欧共体各成员国决定每年召开三次首脑会议，这标志着欧洲各成员国的合作由经济领域扩大到了外交政策合作领域，成员国将会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经济领域的协调。欧共体的这种新的政治一体化合作安排，意味着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制度基本安排完成[[23]](#footnote-23)。1975年，《洛美协定》签署生效，欧共体第一次作为一个单一政治实体同四十六个非洲、加勒比海以及亚太欠发达国家签订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欧共体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1979年，为了稳定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体系，进一步推进共同体内的经济合作，在法国与德国的倡议下，欧洲货币体系（EMS）成立。1979年，欧洲议会第一次选举开始启动，第一批410名欧洲议会议员当选。1981年和1986年，欧共体成员国再次扩张，吸纳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三个国家成为欧共体新成员国。198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单一欧洲法案》正式签署。《单一欧洲法案》不仅包括了《欧共体条约》（EEC），还包含了一些《共同体条约》之外的一些政治合作安排条款。1986年到1993年，欧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深入推进。在《单一欧洲法案》签署生效之后，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被要求满足超过三百多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规范，以取代之前为这些申请国所设立的入欧国家标准。随着苏联的解体，欧共体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9年12月，在欧洲委员上成员国希望在1990年底完成统一的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体系的建设。1990年6月，欧共体成员国签署《申根协定》，协定要求成员国之间废除国家边境管制，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1993年，被称作为“欧盟条约”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仅将共同外交、防务、内政以及司法政策纳入到《欧共体条约》中，并且还明确确定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政策目标。自此，欧洲联盟诞生，欧洲一体化完成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欧洲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特征是分不开的。二战结束之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政治经济集团加紧对全世界的争夺。首先，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美国在西欧的一体化启动初期提供了大量帮助，美国希望西欧的一体化合作能够遏制苏联势力在欧洲的不断扩张。美国在西欧各国的支持下制定了以经济援助换取政治支持为原则的“马歇尔计划”。在“马歇尔计划”提出之初，美国明确表示，欧洲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马歇尔计划”中去，并将德国纳入到欧洲战后合作体系中去[[24]](#footnote-24)。其次，法国在欧洲一体化早期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丘吉尔最初提出了近代的“欧洲合众国”构想，但是基于主权及国家自主性的考虑，英国并没有参与到实质性的谈判中去，法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欧洲一体化早期的推动者。虽然，由于欧洲政治强人-戴高乐对一体化可能带给法国的主权冲击，导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AEC）的思想并没有比“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有更多的进步，但是仍然为西欧各国共同政策制定提供了可能[[25]](#footnote-25)。战后新国际秩序秩序被重建；用西欧一体化武装“自由世界”；并且在一体化过程中得到了超级大国的支持。这是“欧洲一体化”启动之初所面临的国际背景。

**2.2.2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构建及其历史背景**

与“欧洲共同体”启动时的国际背景相似，“经济互助委员会”也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呈现出对抗态势。1949年1月，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六国代表在莫斯科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协调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计划及发展，总部及执行机构设在莫斯科。此后，“经济互助委员会”又吸引了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蒙古、古巴、越南等国的加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互助委员会”发展成为了一个横跨欧洲、亚洲和美洲大陆，包含有十二个正式成员国的一体化组织，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纪的历史进进程。

1947年，美国开始在欧洲大陆推行“马歇尔计划”，试图以金元援助的方式换取被援助国家的政治支持。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更加紧密团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月在斯大林和罗马尼亚的倡议之下，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以及波兰等六国在莫斯科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虽然关于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莫斯科成立的相关文献并不多，且学界对于1949年在莫斯科“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相应组织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在整个一体化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存在着争论。但是，学界普遍认为，1949年的“莫斯科会议”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的开端。“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成立初期的目标是“共享经济发展经验，相互提供技术援助，并且在原材料、粮食以及机械设备领域加强合作”，在具体的合作目标及方式上表述较为模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上台，“经济互助委员会”迎来了一次快速发展的契机。但是由于东欧各国照搬“苏联模式”，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未能满足国内民众的预期，“经济互助委员会”发展陷入到停滞[[26]](#footnote-26)。即便如此，“经济互助委员会”在50年代还是出现了一次成员国扩大。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1954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召开了第四届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济互助委员会”提出，“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宗旨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经济合作和协调国民经济计划。50年代末，中国、朝鲜、越南以及南斯拉夫等国成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观察员国。1957年，《莫斯科宣言》签署，《莫斯科宣言》确认了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尊重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关系。在此之后，关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设置，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劳动力分工的讨论，开始被提上了议程。在1959年到1960年之间，“经济互助委员会”制定、讨论并通过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宪章》（Comecon Charter），《经济互助委员会宪章》规定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全面的经济合作。1962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又通过了《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Division of Labor），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的基本思路，指出要在“共同经济制度、国家结构以及相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之间经济计划的协调、工业制成品方面的专业化细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以及在贷款、科学技术的合作，从而实现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总体合作[[27]](#footnote-27)”。1964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成立。1969年，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特别会议上，“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方针”首次被提出。1971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关于未来合作及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拓展的综合规划》（The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the Further Extension and Improvement for Cooperation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ic Integration by the Comecon Member Countries）出台，这个文件明确提出要“打破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成员国之间物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28]](#footnote-28)。这个文件不仅提出了要在社会主义成员国之间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更重要的是，这个文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提出了要在成员国之间实现“全面的一体化”[[29]](#footnote-29)。1975年，经济互助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经互会成员国（1976-1980年）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草案》，草案要求各成员国根据这一草案精神修订各自国家的“五年计划”。1984年6月，“经济互助委员会最高级经济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合作与科技合作基本方针的声明》。1985年5月，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主管经济的党中央书记会议上，成员国代表指出了集体制订《到200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的重要性，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成员国技术、经济的“独立性”。同年6月，在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各成员国讨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是科技合作等问题。同年12月，“经济互助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到2000年经互会成员国科技进步综合纲要》。随着东欧剧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作用越来越小。1991年6月28日，“经济互助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经济互助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

“经济互助委员会”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实力迅速扩张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各成员国中制定一个统一的计划政策，以协调各国工业的发展[[30]](#footnote-30)。随着东欧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美国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推行，东欧各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工业一体化机构，以协调各成员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抗衡“自由世界”。另一方面，苏联对美国在欧洲的扩张感到担忧，为了防止美国在经济上拉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原则相适应的一体化组织，抗衡美国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经济互助委员会”和“欧洲共同体”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都是在冷战前夕所发起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成立初期也得到了超级大国的支持。两个一体化组织具有相似性。

**2.3 “欧洲共同体”的推进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失败：对成员国性质的讨论**

如上文所述，“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大体上成立于同一时期，在同样的国际背景下成立，并且两个组织在成立初期的目的都是相似的，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两个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共同体”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各种不信任危机，但是在各成员国的妥协和努力之下都最终被克服了，实现了西欧经济、政治甚至军事领域的一体化深入发展，成为了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统一力量。而“经济互助委员会”尽管在早期提出了更为宏伟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的统一目标，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一体化成就，最终在“东欧剧变”之后走向灭亡。因此，尽管在我们在时间线上进行了变量控制，还需要对两个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性质这个变量进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影响两个一体化组织成败的关键因素。

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这两个重要的一体化组织缺乏必要的比较研究，但是仍有部分学者试图对“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两个一体化组织的不同命运分别作出解释。综合来看，现有的文献对这两个一体化组织的不同命运的解释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联系、地理区位，以及文化及意识形态亲缘性等。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这些解释，并指出这些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欧洲共同体’能取得成功，而‘经济互助委员会’却走向了崩溃”这一问题。

**2.3.1 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及贸易联系**

对两个一体化组织中的成员国进行经济发展程度，及相互之间贸易联系水平的分析，是解释一体化组织发展不同命运最为流行的解释。正如上文笔者所述，Hass在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时，指出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是一体化得以向前推进的关键因素之一[[31]](#footnote-31)。Hass认为成员国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高度的工业化是一体化继续推进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只有“欧洲共同体”最终得以存活并快速发展、推进的重要原因。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在国家收入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国家收入方面的差异更小，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之间则差异巨大[[32]](#footnote-32)。还有研究指出，“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相对自由，而“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缺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开放性[[33]](#footnote-33)。也就是说，“欧洲共同体”的成功主要来自于成员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经济互助委员会”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使得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不是很紧密，最终导致了一体化的失败。

笔者将通过对同时期“欧洲共同体”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数据，以及他们的对外贸易情况进行分析，试图证明以上基于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特征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消亡。

由于东欧各国以及苏联封闭的政治体系，再加上冷战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经济统计口径及方法的不同，使得获取准确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准确的经济数据变得异常困难。笔者选取了由相对中立的第三方——“维也纳比较经济学研究所”所出版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统计数据（1990年）》（*COMECON DATA 1990*）作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经济数据的主要来源[[34]](#footnote-34)。此外，由于冷战时期的特殊性，使得关于东、西欧完整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得。“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相比较于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更加完整和真实，因此笔者还参考了“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数据的重要来源。

GDP数据是衡量一个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通过比较“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同一时间区间的GDP数据，就能够验证“工业化水平”是否是“欧共体”与“经互会”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的关键。但是由于冷战的原因，东欧各国的GDP数据无论在统计质量还是在统计口径上，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相近庭，此外还存在着众所周知的数据造假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对同一时期GDP数据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缺乏说服力了。笔者认为，一国的经济综合实力可以通过工业化水平来体现，特别在20世纪50-60年代更是如此。而一国的工业化水平可以通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一数据来体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了一国工业活动的频率及密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高，表明一国工业活动就更加频繁，工业会水平越高，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就越强。

由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附录A），“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卢森堡、英国、比利时和荷兰四个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60年到1990年这三十年间的数值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更大。这主要是由于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人口相比较其他西欧国家更少，再加上这些国家工业基础较好，因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大。而英国在“二战”期间相比较其他欧洲国家而言，所受到的战争伤害更小，因而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也更大。如果排除这四个特殊的国家的数据，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国相比，“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较为接近，且“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更小[[35]](#footnote-35)。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好坏以及成员国工业发展水平的高低这些变量，并不能解释“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的成功与“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的失败。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弱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自1970年“社会主义一体化方针”被提出，一直到1990年“经济互助委员会”解体前，“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国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贸易联系，甚至有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严重依赖“经互会”成员国（附录B）。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保加利亚。自1970年到1990年期间，保加利亚的对外出口对“经互会”的成员国长期保持着60%以上的依赖度。这就意味着，成员国之间贸易联系的强弱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或失败没有必然的联系。

综上所述，无论是成员国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强弱，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欧洲共同体”一体化会走向成功，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体化进程却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戛然而止。两个一体化组织中的这些变量不是解决本课题问题的关键。

**2.3.2 成员国的宗教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

在讨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过程中，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论，即试图通过研究西欧各国的文化宗教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理解为什么“欧洲共同体”能够成功实现其一体化的目标。如前文所述，Haas在《国际一体化：欧洲的过程与普遍的过程》（*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一文中，指出了“欧洲共同体”一体化实践的三个必要条件，即超国家的机构必须应当与成员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基础相适应；成员国要有相对比较发达的工业和经济；以及成员国之间要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Hass认为，只有当一体化组织同时满足了满足了上述条件的时候，一体化进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36]](#footnote-36)。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所谓的“欧洲文化认同”以及“欧洲身份”是西欧一体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例如，Behr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观念来自于19世纪的欧洲，这种欧洲国家的“文明的标准”将欧洲国家政治经济的联合当作为欧洲的普遍规范[[37]](#footnote-37)。中国学者陈乐民也认为，欧洲一体化观念是一股一直存在于欧洲各国历史的潮流，而这种潮流使得西欧各国能够使得一体化取得成功[[38]](#footnote-38)。

这种观点非常流行，以至于从文化、宗教甚至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释一体化进程的成败成为了一种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但是如果将“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体化进程进行实证比较的话，就会发现通过对成员国的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文化进行比较来解释一体化进程的成败，实际上是缺乏说服力的。

传统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的相似性能为一体化各成员国制造出一种所谓的“集体意象”，使得各成员国形成一种集体的归属感。就“欧洲共同体”而言，“欧洲共同体”最初的六个成员国都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上都存在诸多的相似性，因此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会降低一体化合作中意识形态上的沟通成本，一体化进程更容易取得成功。笔者对“政治意识形态相同能够有效降低合作成本”的解释是认同的，然而这并非是“欧洲共同体”取得成功，而“经济互助委员会”走向失败的原因。

Freedom House是一家1941年成立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主要专注于民主、政治自由以及人权的学术研究。Freedom House每年会定期发布《年度世界自由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Report*），报告主要是针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自由程度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程度进行评估，根据其报告的结果能够区分出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39]](#footnote-39)。通过Freedom House年度报告中对“欧洲共同体”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各成员国的政治自由程度的评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两个一体化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分野。虽然Freedom House主要由美国政府资助，在意识形态评估上的标准及口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见。但是笔者认为，Freedom House的评价标准虽然带有偏见性，但是评价标准却是固定的，仍能够通过Freedom House的年度报告发现两个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分类。

在Freedom House在1980年的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附录C），“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自由程度上大体相似。同样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在自由程度上也呈现出大体相似的情况。这就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同与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能够得到持续地推进，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一体化进程却遭到了挫折。

同样的，宗教或文化的相似与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欧洲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进程的失败。在“欧洲共同体”内，虽然在成员国的宗教信仰中，“罗马天主教”在几乎每一个成员国中所占的比例都相对较高，但是在某些国家中罗马天主教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其中不乏像荷兰和联邦德国这样“欧共体”早期的缔造者。总体来看，“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趋势，也就是说实际上“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统一宗教”或“统一文化”。这也就意味着，用宗教或文化上的共同性与否，来解释两个一体化组织的发展状况也是缺乏说服力的（附录D）。

**2.4 本章小结**

通过对“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时间和国际格局背景变量，还是诸如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联系程度，以及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这些变量，都不是影响两个一体化组织不同结局的关键变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在初期非常相似的一体化组织，最终却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呢？

通过相异案例的比较研究，笔者发现在“欧洲共同体”启动的早期阶段，成员国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建立了成员国之间在安全上的信任关系。具体来说，西欧六国最初在煤炭、钢铁以及原子能领域上进行了合作，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还蕴含着非常浓厚的政治意味。由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成功实现了对成员国的煤炭、钢铁和原子能的一体化约束，不仅仅做到了对成员国的工业生产调控，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使得成员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以及在原子能领域可能进行的军备竞赛变得不再现实，不会再出现成员国之间相互炫耀武力，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局面。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由于成员国之间不再存在被武力威胁的顾虑，成员国就更倾向于在一体化其他问题上寻求妥协，从而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与之相对的是，“经济互助委员会”从启动之初就没有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和解，再加上“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进一步破坏了国家间信任的基础，更加人层次的一体化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在第四章中，笔者将详细对这一理论假设进行阐释，并在该核心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可以检验的理论预测。

**第三章 “安全信任”因素与区域一体化初期阶段**

通过上文对“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两个组织在成立的历史背景及成员国的特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欧洲共同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无论是一体化组织成立的目标、国际背景及环境、成员国特征及一体化内在动力上都比较类似，因此这些变量都无法回答为什么两个一体化组织最终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由于两个一体化组织在一体化发展的初期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安排，导致了一体化组织后续的发展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一体化组织只有在其发展的启动阶段，建立一种制度安排解决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安全顾虑，只有这样区域一体化才有可能在后期得以被持续深入推进。

**3.1 区域一体化及其发展阶段**

根据一体化理论中的新功能主义立场，一体化是（或区域一体化）“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若干不同民族实体内的政治行为，其将忠诚、期望和政治行动转向一个新的中心。这一新的中心的机构拥有或要求对原来就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政治一体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一个置于原来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之上的心的政治共同体。[[40]](#footnote-40)”本课题认同哈斯对“区域一体化”的定义。笔者认为，一体化进程的标志是出现一个超越成员国主权中央政府权威之上的超国家机构，这个机构不仅能够为成员国制定共同的经济政策，还能够对成员国的政治决策形成直接的影响力。根据这一标准，很多国际组织虽然存在着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中央政府之上的决策机构，并且这个机构能够对成员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力。但是，决定主权国家是否遵守其决议的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各成员国的主权政府手中，并不能对成员国施加直接的、绝对的影响力，因而这些广泛存在的国际组织并不属于本课题所界定的一体化范围之内。而“欧洲联盟”（及其前身“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这类组织，不仅存在着一个超越主权国家政府之上的超国家机构，而且这个超国家机构做出的决定，所有成员国政府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绝对服从，因此我们认为像这类国际组织属于本课题中“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研究范围。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有着其发展的阶段。施密特也提出，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会出现“环溢”（Spill-around），一体化组织职能的范围扩大，但是其权威并没有随之扩大；“权威加强”（Buildup），即一体化合作虽然没有扩大到其他领域，但是一体化组织无论是在决策的自主性上，还是在权威上都得到了加强；“权威削弱”（Retrenchment），一体化组织内部的决策的仲裁性得到了加强，但是其权威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回缩”（Spill-back），这一时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在职能范围上还是在权威上都收缩到了外溢之前的状态[[41]](#footnote-41)。施密特进一步指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上述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体现。根据施密特对于一体化发展阶段特征的描述，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可以划分为“组织机构的形成及初创”阶段、“组织机构的发展”阶段、“组织机构的成熟”阶段，或“组织机构的衰落”阶段（组织机构形同虚设）。在“组织机构的形成及初创阶段”中，建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议程被提出，并且在这一阶段中，一体化组织形成了最初的组织结构框架，形成了由以几个核心国家为主体的区域联盟。这一阶段由于一体化合作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仅限于一些技术和经济层面。在“组织机构的发展阶段”中，区域一体化合作的范围进一步被扩大，有原来的经济和技术领域逐步拓展到了一些政治议题。同时，一体化组织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且被成员国认同的组织纲领。在“组织机构的成熟阶段”中，一体化的合作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并且一体化组织形成了完备的组织决策机制，在社会领域上一体化文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组织机构的衰落阶段”，一体化组织的发展陷入到了瓶颈期，由于缺乏持续合作的动力，加上成员国之间的政治谈判僵局，一体化进程难以持续推进，一体化组织的共同决策机制受到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笔者认为“组织机构的衰落”阶段是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一体化组织都可能会经历着一个阶段。如果在一体化合作方面，成员国之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并能够从妥协中寻求共同利益，那么这一阶段将会是短暂的，一体化组织仍能够快速经过这一阶段实现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探讨的是一体化组织初期阶段，也就是“组织机构的形成及初创阶段”。

**3.2 “安全信任”关系及其来源**

“安全”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指一种不受威胁的状态。一般来讲，狭义上的“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指国家主权、生存和发展权不受威胁和侵犯的状态。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当今主权国家的安全包括主权与外交关系、政治与价值认同关系、地缘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关系等[[42]](#footnote-42)。国家之间在安全上的相互联系能够产生紧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军事安全以及外交协调为代表的“高级政治”，和以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社会价值观认同为代表的“低级政治”。如果国家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安全上的相互信任关系，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能够被进一步发展。

“信任”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学者指出，“国家之间的关系式战争还是和平，归根结底是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相互信任的国家能够维持国家之间的和平，反之缺乏相互信任的国家往往会趋于发生战争或冲突。因为他们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并且认为对方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发动进攻。[[43]](#footnote-43)”然而有关于“信任”理论的研究却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1958年，多伊奇（Morton Deutsch）在《冲突解决杂志》上发表了《信任与猜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多伊奇第一次讨论了“信任”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他认为“信任”是指“行为体期望某件事发生并采取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与预期相反带来的负面动机影响大于预期相符时所带来的正面动机影响”[[44]](#footnote-44)。政治心理学家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在《国际关系中的信任与机会丧失》一文中指出，所谓“信任”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分别是“可预测性”、“可信性”以及“良好的意图”[[45]](#footnote-45)。根据上述对“信任”的定义，“信任”并非是静态不变的，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改变。“信任”可以在某一时间点因为某个事件而出现，同样也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因为某个事件而消失。中国学者尹继武在回顾了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信任”的文献后，认为“信任”的概念主要包括有两个维度，即“信心”与“承诺”[[46]](#footnote-46)。具体来说就是指，两个相互信任的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都会认为对方在行动过程中不会背叛自己，并且能够给予自己所需要的支持。笔者认为这一对“信任”的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对这一概念做出界定，并且能够根据这一定义进行概念的“操作化”，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

“安全信任”关系是“信任”关系中的一种。“安全信任”关系指的是在安全领域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彼此信任对方没有在安全上威胁自身的意愿和能力，并且相信对方在涉及到关系自身安全的方面时能够给予支持。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来源即有先天的客观因素影响，同时也有一系列偶然因素或者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先天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有：历史上国家之间长期友好关系；在地缘上拥有共同的边界线，形成在地缘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美好的历史记忆。这些国家之前先天的客观因素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国家之间建立“安全信任”关系的成本。除了客观的先天因素之外，国家之间也有可能通过一系列偶然或者人为主观的措施进一步加快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进程。例如，即便是国家之间在历史上有某种矛盾和纠纷，但是却通过某种措施或制度安排，形成了互利合作的规范，进而实现了相互之间在安全上的保证。国家之间不再担心对方的行动可能会给自己的带来安全上的威胁。

笔者认为，“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不仅会极大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安全信任”关系能使国家之间打破相互怀疑的藩篱，使得开展程度更高的国家间合作成为可能。

**3.3 “安全信任”关系影响一体化进程的途径和表现**

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成员国之间是否建立了“安全信任”关系，是一体化成员国是否愿意将本国未来发展的福祉托付给其他国家，进而实现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关键。“安全信任”关系是一种社会心理建构，成功实现对这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对于本课题来说显得尤为关键。

尹继武在《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一书中认为，“信任”关系的形成有两种模式，即“工具性信任”（instrumental trust）和“情绪性信任”（emotional trust）。“工具信任”是一种“期望信任”，即指信任是一种基于成本最大化的纯粹理性决定；而“情绪性信任”则是一种非理性化的情绪反映，即将他人的利益建立在自我利益之上的期望[[47]](#footnote-47)。“联盟组织内部同样也是这两种基本的类型，但是特定组织的信任应是在这两种基本类型组成的连续谱之间流动，这也就是信任的动态性与时间性特征。”[[48]](#footnote-48)“信任”关系的建立应该即具有理性选择的特征，也应具备非理性情绪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解“信任”这一概念的同时，也能够对“信任”这一抽象进行“操作化”，使得本课题的后续研究成为可能。基于上述对“信任”关系模式的分类，笔者认为“安全信任”关系应该包括有理性以及非理性的维度。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安全信任”关系成功构建之后，主要有三个具体可以观测到的表现：1）“安全信任”关系构建之后，将会通过影响政府及民众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建立高度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影响国家间在合作问题上的态度；2）国家间愿意在“高级政治”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并愿意将涉及到“高级政治”的主权让渡给其他组织；3）“安全信任”关系成功构建，使得国家之间各层次的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总的来说，“安全信任”关系构建之后，会通过上述三个关键因素，影响国家之间对于合作的态度，降低国家间一体化合作成本，进而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3.3.1 媒体、民意与政府**

国家之间“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会通过影响国内媒体以及公众对本国看法的方式，促使政府朝着顺应民意的方向，实现国家之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在现代政治科学的概念中，一国政府是一个国家总体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威权国家中，政府总是能够反映并代表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总体利益。特别是在民主社会中，国内各个利益集团总能够通过某种渠道反映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并力争使自己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除了被动接受各个利益集团的游说而制定政策之外，通常在其内部也有着自己的“部门利益诉求”，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制定某项政策的时候还具有某种主动性，即其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受到自身部门偏好的影响。米尔纳认为，政府内部各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决策偏好，不同的政府结构有不同的政策制定偏好和利益诉求，从而深刻影响着国内外政策谈判的进程[[49]](#footnote-49)。中国学者王存刚在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也认为，中国内部广泛且独特的政府机构在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也反映了自己的部门偏好及影响力[[50]](#footnote-50)。因而，政府如何从外部接收到信息，以及政府部门从外部接收到了何种信息，都能够对其政策制定的偏好产生影响。

国内利益集团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主要的信息来源。哈斯认为，一体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国家间参与一体化的各个单元内的主要利益集团，对其加入一体化组织后可能的收益或损失的预期。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时发现，欧盟成员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1]](#footnote-51)。米尔纳在《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中，通过“双层博弈模型”提出了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合作需求这两个层次的互动会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52]](#footnote-52)。由此可见，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样的，对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与推进而言，国内各利益集团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得失是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媒体在影响公众或利益集团和政策部门过程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1972年德国学者诺依曼在东京举办的“世界心理学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她认为，公众舆论并非是公众或各个利益集团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迫于“意见环境”的压力，被迫对“优势意见”服从的非理性过程[[53]](#footnote-53)。这个理论进一步提出，“媒体内容”是大众判断社会舆论分布的重要来源，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意见可能是少数派时，通常就会保持沉默[[54]](#footnote-54)。这就意味着，媒体对于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态度能够深刻影响到民众、利益集团甚至政府对于合作的态度与认知。民意可以通过媒体将民意进一步放大，同时又将结果反馈到民意中，对民意施加影响。

笔者认为，当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得以成功构建之后，民众、国内各利益集团都会广泛受到大众传媒对于合作态度的影响。当大众传媒对于“区域一体化”合作持乐观和支持态度时，这一情感会通过媒体的传播效应影响其他人，从而形成对于合作持乐观态度的“优势意见”。这一“优势意见”会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继而通过政治表达渠道影响政府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态度。而政府对外支持“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也会反过来影响了大众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于合作的意见。正是在这样大众传媒、民众以及政府三方相互影响的互动之下，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开始逐渐内化，并形成了国与国进行一体化合作的规范。

**3.3.2 “高级政治”合作**

“高级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级阶段的反映，“高级政治”往往与国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55]](#footnote-55)。经典一体化理论认为，一体化得以深度向前推进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国家间的合作开始由“低级政治”（Low politics）领域“外溢”到“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由贸易、环境、电信、航空、移民、投资等领域的合作逐渐转移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56]](#footnote-56)。

对于一体化进程形成的初期阶段来说，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会通过成员国之间进行“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方式加以体现。当国家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安全信任”关系时，国家之间就能够就涉及到各自国家核心利益的“高级政治”领域进行合作的探索。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国家间“安全信任”关系建立的实质就是指，各个合作的国家都相信对方国家既没有对本国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的能力，也没有对本国安全利益造成威胁的意愿。一旦这样的“主体间意识”得到建立，那么国家就会更愿意在“高级政治”领域上展开充分的合作。

一旦国家之间在“高级政治”领域内开展了有效的合作，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将跳过所谓“外溢”阶段，直接加强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进而推动未来阶段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合作是建立在行为体对“成本-收益”进程估算的基础之上的。影响国家间进行合作的主要因素就是“对相互合作的意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代单独行动和竞争获利的想法”[[57]](#footnote-57)。正如Robert Axelrod所指出，“（合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缺乏中央权威强制合作而存在自利行为的背景下发展合作理论。”[[58]](#footnote-58)笔者认为，当“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在一体化进程的启动阶段或初期阶段得以形成时，国家之间在这时不再仅仅基于“自利”的考虑而行动，因为在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合作的“高级政治”领域中的合作经验，就能够使行为体产生一种能够在其他领域中成功合作的期望，“自利”不再是一种能够使自己获得更多收益的理性行为，从而行为体会更多的考虑合作。

**3.3.3 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交往**

国家之间“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能够促进国家之间更具深度和频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同时，深度以及高频度的国家间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能够塑造更多的合作文化，从而有效降低国家之间在未来合作的成本，进而推动一体化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国家间“安全信任”关系建立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器，还包括有广泛存在的社会公众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互动中，国家行为体不仅仅是影响国家之间相互交往方式和程度的唯一因素。在现代国家，公民以及公民组织也能够深刻影响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行为模式。有学者指出，国家之间互动的频度和密度能够深刻塑造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在一体化进行的形成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持续高密度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塑造了国家之间交往的规范和认同，而这将会导致国家之间进一步进行深入合作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国家之间不再持续对抗和怀疑，而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状态，这就使得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实现更加深入的合作成为了可能。

此外，在分析“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过程中，对国家之间的贸易性质和状态进行分析也至关重要。尽管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能够帮助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并且还能够实现国家之间持久和深入的合作。一体化理论的新功能主义也认为，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合作会“外溢”到其他一体化的合作领域。但是，一些针对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指出，国家之间不平衡的贸易联系也将会损耗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信任，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并非一定有利于国家之间形成合作的状态，还要关注国家之间的贸易性质和状态。

笔者认为，国家之间贸易的平衡会积极影响到国家之间的贸易性质，继而影响到国家之间总体关系的基本性质。如果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一种顺差和逆差的相对平衡，且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存在不平等的贸易协定，那么国家之间的贸易就能够促进国家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国家不再是仅仅关注其他国家在安全上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卡赞斯坦指出，当前的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指军事安全，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安全。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关注军事安全威胁的同时，也会积极关注其他领域可能会带给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冲击。因此，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平衡的贸易关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相对棘手的问题的相互妥协，从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3.4 本章小结：文章的预测性假设**

“信任”可能会在某一时间因某一事件而出现，也会在某一时间因某一事件而消失。但是由于“历史记忆”和“经验教育”等因素，合作初期所建立的“信任”关系会为未来以“信任”为核心的合作奠定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区域一体化”初期阶段的“信任”关系式如此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信任”关系可能会有很多种，其中“安全信任”关系是“信任关系”中的高级表现形式。成员国之间一旦建立了“安全信任”关系，就意味着各国可以将本国最核心的安全主权托付给其他国家，因为他们相信建立了“安全信任”的国家之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对本国产生安全上的威胁。由于“安全”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高级议题，因此建立起真正的“安全信任”关系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国家或组织能够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的原因。当国家之间在一体化启动阶段就建立起可靠的“安全信任”关系时，“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初期阶段就能通过建立合作规范以及降低合作成本的方式实现后续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推进。

为了通过后续两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案例对以上假设的验证，文章拟提出以下可观察、可验证的预测性假设。

首先，“区域一体化”能否成功建立并得到持续的推进，合作国家所具备的一些客观的先天因素是无法被忽视的。例如，国家之间的地缘条件，国家之间的文化、历史渊源等。这些客观因素能够影响主观因素作用的发挥。在现实的案例中，成功推进“区域一体化”的组织成员国之间都往往应该在地缘上相互接近，并且在其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存在着一段美好的共同历史记忆。

其次，“安全信任”关系影响国家间合作是通过建立国家间合作“规范”和“文化”，以及通过降低国家间“合作成本”这两种主要方式而发生作用的。当“安全信任”关系建立之后：1）国家之间会通过社会公众、媒体以及政府形成一种友好合作的文化，从而降低国家之间进行深度一体化合作的成本；2）一体化进程中的更多的“高级政治”合作被提上政策议程。“安全信任”关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高级政治”方面的合作，但是一旦“安全信任”关系得到建立之后，推进进一步的“高级政治”合作就更加水到渠成；3）“安全信任”关系之后，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在贸易关系上得到体现。

如果这一预测成立，在“欧洲共同体”成立的早期，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成员国之间进行“安全信任”合作的努力尝试。当“安全信任”关系得到成功构建之后，我们将会看到：“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国内民众对一体化进程的支持；成员国政府愿意就“高级政治”领域进行合作；以及成员国在贸易领域上交流更加紧密、更加平等。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我们则会看到与之相反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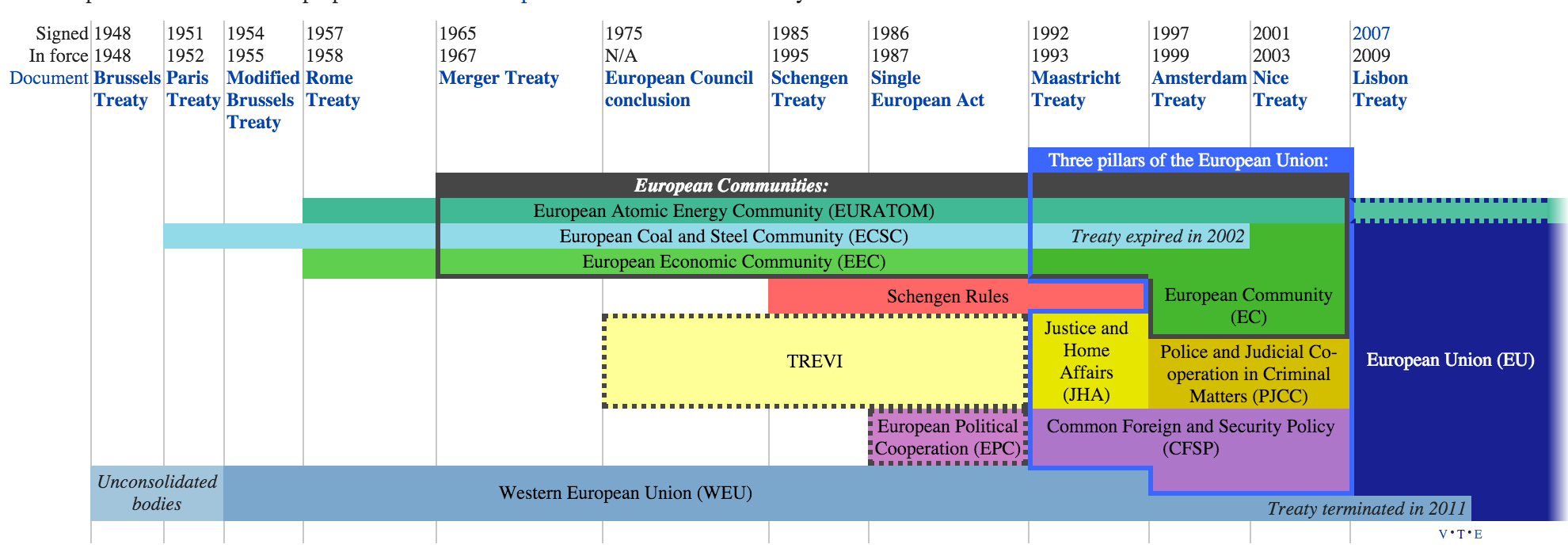
在下面一个章节中，笔者将对“欧洲共同体”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两个案例进行分别分析，并指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具有建立“安全信任”关系的先天优势，并且在“欧洲共同体”开始启动的初期，成员国就在安全领域建立了互信关系，而这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对待一体化的态度。“经济互助委员会”不具备建立“安全信任”关系的客观条件基础，而且在一体化进程启动初期，成员国之间就始终存在着猜疑，这对于“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期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四章 “欧洲共同体”的推进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失败：“安全信任”因素的解释

**4.1 “欧洲共同体”前后（1950-1992）**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是一个主要由西欧发达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1948年的“海牙会议”（也叫“欧洲统一运动大会”）结束之后，“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宣告成立。但是这个机构仍然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低层次的合作机构，并非笔者意义上的一体化超国家机构[[59]](#footnote-59)。1948年“布鲁塞尔条约”签订，西欧各国开始在军事领域上进行合作；同年，推动欧洲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宣告成立。1950年《巴黎条约》签订，“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宣告成立，同时也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开始正式启动。1957年《罗马条约》正式签署，“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超国家机构，标志着“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图一），1992年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标志着“欧洲共同体”正式转变成为“欧洲联盟”。

**图一：“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历程**[[60]](#footnote-60)



**4.1.1 “欧洲共同体”取得成功的先天条件**

从1957年《巴黎条约》签订，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欧洲共同体”共有十二个正式成员国，分别是比利时（1957）、意大利（1957）、卢森堡（1957）、法国（1957）、荷兰（1957）、联邦德国（1957）、丹麦（1973）、英国（1973）、希腊（1981）、葡萄牙（1986）和西班牙（1986）。这十二个成员国无论在相对的地缘位置，还是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上都有着广泛的共通性。这些共通性决定了“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相对于其他一体化组织而言更容易被其成员国广泛接受和理解。

**4.1.1.1 集中的地缘位置**

“欧洲共同体”的十二个成员国在地缘位置上相互接近（附录E）。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最初留个创始成员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联邦德国，不仅在地缘位置上相互接近，而且还拥有着漫长的共同边境线。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国家再陷入到冲突或战争，那么他们讲不得不再次面临着像“一战”和“二战”那么巨大的损伤。相对集中的地缘位置，以及共同漫长的边境线，使得“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家之间更容易建立密切的“信任”关系。

**4.1.1.2 共同的历史记忆**

“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拥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及文化遗产，这些共同体般的共同历史记忆对这些国家建立“安全信任”关系至关重要。早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统一欧洲”的概念就已经出现[[61]](#footnote-61)。1464年波西米亚国王George of Pobebrady提到了建立一个统一欧洲的设想。19世纪时，拿破仑波拿巴也提到“如果欧洲大陆国家之间能够实现自由的人员流动，人民的国家身份能够被自由塑造，那么一个统一的欧洲也是可能的。[[62]](#footnote-62)”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一文化认同深刻影响着西欧国家交往的方式，也深刻塑造着“欧洲共同体”国家的行动规范。在近代，一些欧洲的学者也在不断提出“统一欧洲”的思想。1923年，欧洲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Richard Nikolaus Eijiro写了一本“统一欧洲”思想的小册子，第一次提出了“欧洲联合”的概念。后来的“统一欧洲”的坚定支持者Aristide Briand深受Richard Nikolaus Eijiro的思想影响，他所领导的“泛欧洲运动”(Pan-Europa)也得到了当时欧洲社会名流的广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联合”概念再次出现。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欧罗巴合众国”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建立一个欧洲国家共同体的设想。在“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的早期，支持该计划的欧洲政治活动家有人表达过欧洲统一的思想。

事实上，关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集体认同的论点上，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此问题的研究，特别是2002年Mark Aspinwall在所发表的《欧洲国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偏好》一文中，对欧洲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支持“欧洲一体化”与否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证研究。Mark Aspinwall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对截止到1997年“欧洲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国国内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其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越靠近国家的决策中心就越支持“欧洲一体化”。此外作者还发现，欧洲国家中相似的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有效地降低决策的交易成本，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政府在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这个问题上的决策[[63]](#footnote-63)。这就意味着“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或者集体认同能够很容易被转化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的支持。一旦“安全信任”关系得到成功构建之后，基于欧洲国家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集体认同

**4.1.2 “欧洲共同体”的成功推进**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相对集中的地缘位置，以及基于共同体意识的相同意识形态，使得“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具有更加容易推进“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先天优势。但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的成功推进的关键是建立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一体化启动之初就开始努力建立“安全信任”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各成员国在“安全信任”构建问题上取得突破，才能为一体化进程未来的持续推进诸如动力。

**4.1.2.1 “安全信任”关系的建立**

一体化初期阶段确立的“高级政治”合作对成员国之间建立“安全信任”关系至关重要。当各成员国在“高级政治”问题上取得突破之后，关于一体化过程中后续的“低级政治”问题才能被更容易地解决。

就“欧洲共同体”在一体化启动的初期阶段的发展历程来看，“欧洲共同体”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在“欧洲共同体”启动之初，就决定六个国家需要在煤炭、钢铁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合作。这种合作不再是旧式的政府间磋商或谈判，继而相互妥协达成一个针对某个领域的政府和作文本，而是要组建一个超越各个成员国政府的超国家机构统一对成员国进行管理，由这个超越主权的超国家机构负责制定所有成员国在煤炭、钢铁和原子能等领域的具体合作方针，各个成员国政府有义务遵守。尽管各个成员国在能源和资源领域内的合作带有典型的经济合作特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共同体”最初的六个国家在煤炭、钢铁和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使得这六个国家相互觊觎资源，相互发动大规模战争变得不再现实[[64]](#footnote-64)。特别是对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陆上主要强国来说，其意义更加显著。在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共同体”最初六个成员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实际上是在“高级政治”领域内取得的非常珍贵的突破。建立一个统一的“超国家机构”，废除了各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说是这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启动阶段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的一次成功实践[[65]](#footnote-65)。

不仅在煤炭、钢铁和原子能政策上，各个成员国实现了协调，在“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决策机构设置以及职权的划分方面，也为“欧洲共同体”初期阶段的“安全信任”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机构设置上成功构建“安全信任”关系的一个最突出表现就是各成员国政府同意在“煤钢共同体”中设立一个“超国家机构”凌驾于成员国主权政府之上，并且这个机构的组织及决策原则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平等。1948年创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由于深陷政府间主义的影响，其运作几乎陷于瘫痪。时任“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理事会协商会议主席的斯巴克对此深感失望，在宣布辞去这一职务所发表的演说阐释了建立“超国家机构”的必要性：

“*你是否真的想建设欧洲而又不想创建一个超国家的欧洲政府？你是否真想建设欧洲而同时又要维护你的国家主权？如果这是你的目标，那么我们必须分道扬镳，我相信你的目标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要知道，想创立新的欧洲而又不想干涉国家主权是不现实的。*”[[66]](#footnote-66)

“煤钢共同体”吸取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失败的经验，建立了一个“高级机构”（High Authority）来管理所有成员国的煤炭钢铁工业。舒曼在为这个“高级机构”进行辩护时指出：

“*成员国首先要接受、服从于‘高级机构’的意志。……首次进行超国家政府的实验正在进行，这个超国家政府将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权力组合或妥协。*”[[67]](#footnote-67)

让“煤钢共同体”所有成员国接受这样一个机构并不容易。“煤钢共同体”需要在组织架构和活动原则上体现出成员国之间广泛的平等和尊重。根据《巴黎条约》（以下简称“《条约》”）中有关“高级机构”的有关条款，“高级机构”由九名委员组成，每个成员国的委员最多不得超过两名。同时，“高级机构”还设立主席和副主席各一名，以各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方式选举产生。《条约》还规定“‘高级机构’应当为共同以一般利益而服务，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他们将不请求也不接受任何政府或组织的指示”，“高级机构”在进行有关煤钢生产、消费、市场调节、筹措贷款及信用担保等问题上“需预先取得理事会特定多数或全体成员一致做出同意表决”[[68]](#footnote-68)。可见，“煤钢共同体”无论在组织架构上还是在活动原则上都充分准中了每个成员国的利益，最大化地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建立，这对于法国和德国之外的小国来说至关重要[[69]](#footnote-69)。

“煤钢共同体”实现了成员国之间在国家安全上的合作，并且通过“煤钢共同体”的机构设置及决策原则赢得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尽管在“煤钢共同体”之后，共同体内的成员国围绕吸收英国加入共同体、投票权和决策权等问题上产生争执，但是西欧六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已经得到建立，这就使得成员国之间不会再去揣测“欧洲共同体”的决策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机，而仅仅将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具体的政策问题上。事实上，“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吵也从未脱离过政策的范畴。

**4.1.2.2 社会公众及政府的支持**

“安全信任”关系建立之后，成员国之间的社会公众及各国政府对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持乐观态度，各项政策也随着各国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支持得到逐步推进。一体化成员国的社会公众和政府都相信，一体化的进程不会对自身产生威胁，其他成员国在一体化组织内的行为都是可控且可以预测的。这在一体化进程开始启动的初期阶段至关重要。同样的，成员国国内的社会公众和政府在一体化进程中对“高级政治”的支持和信任，也会使得各成员国政府在进行一体化更深层次的具体谈判中减少更多障碍。

“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德等过一小撮政治精英在几乎类似与“秘密外交”的形式下完成的，无论是“欧洲共同体”最初的政策文本还是各个成员国为实现这个组织而在政策上的妥协，都没有经过公民的广泛参与。

社会公众对政策的参与可以分为“情感支持”和“功利支持”两个维度。所谓“情感支持”是指社会公众受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影响时的反应；而“功利支持”指的是政治系统输出之后，社会公众对政策结果评估之后的纯理性计算[[70]](#footnote-70)。从西欧六国社会公众和政府的理性计算角度来看，“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所产生经济的积极效应，是他们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以“煤钢共同体”为例。当“煤钢共同体”得到所有成员国的支持建立之后，成员国之间就钢铁和煤炭的生产规模、价格制定，以及与此相关的贸易、信贷投资、劳工保护及充分就业等方面出台大量的配套措施，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有研究显示，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之后，1953年到1955年期间，六个成员国在煤炭和钢铁的关税和生产规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共同体的贸易总量中，钢铁产品增长了151%，废铁增长了57%，煤炭产品增长了50%。“安全信任”建立的同时导致了这样有益的合作成果是所有成员国都乐于看到的，因此也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在“欧洲共同体”的“安全信任”合作建立之后，欧洲社会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情感支持”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根据美国学者Richard L. Merritt和Donald J. Puchala针对1950年到1962年十年间西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研究可以发现，从1950年开始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公众对欧洲一体化总体持积极态度。在这项研究中，两位学者还发现在1955年法国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之后，法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出现显著的下滑[[71]](#footnote-71)。这项研究表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由“高级政治”合作的失败而产生的对“安全信任”怀疑可能会对社会公众的情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还发现，在针对英国政治社会精英的一项同样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建立之后，79%的英国政治精英对“欧洲共同体”的设想持赞成态度，到了1968年持支持态度的调查者达到了89%的历史最高点。在法国与英国就加入“欧洲共同体”问题上产生争执之后，这一结果下降到了48%。这项研究的研究意义在于，无论是“欧洲共同体”的普通社会公众还是政治精英，在“安全信任”关系得到建立之后，他们对“欧洲一体化”持积极态度；反之，当成员国之间产生不信任时，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都倾向于不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目标。

当“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都对“欧洲一体化”持积极态度时，“欧洲一体化”合作就成为了成员国之间进行进一步更深入合作的活动规范。

**4.1.2.3 欧洲一体化的推进与“高级政治”合作**

“欧洲共同体”与世界上其他类似的一体化组织所不同的是，“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合作是从“高级政治”的合作开始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体化进程早期阶段中成员之间建立“安全信任”之后，各种其他的“高级政治”合作议程也得以陆续展开。这也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成功建立起“安全信任”关系的标志。

共同外交政策是“高级政治”合作的一个典型体现。一体化组织能否制定一个共同外交政策是判断一体化组织是否在进行“高级政治”合作的重要标志。事实上，早在1950年法国政府就提出了所谓“普利文计划”的倡议，这个倡议建议欧洲国家开始讨论欧洲的共同防务问题，成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军”。1952年，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并与1953年建立了欧洲政治共同体。但是“欧洲共同体”的政治军事共同体合作过于激进，而且在六个成员国还未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安全信任”关系的时候，就急于提出敏感的政治军事合作也是非常不明智的。1954年，法国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方案，欧洲政治共同体也随之夭折。1960年法国提出的“富歇计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富歇计划”的精神在事实上也违背了“欧洲共同体”对“成员国一律平等”的承诺，很快该计划遭到成员国的反对宣布失败[[72]](#footnote-72)。

随着欧洲政治强人戴高乐下台，欧洲一体化合作回归到了正常状态。这一时期，“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成熟的“安全信任”关系，一体化合作深入到“高级政治”领域也就水到渠成了。在“海牙会议”上，个成员国代表就欧洲“政治一体化”合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会后“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代表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方案，也就是“达维农报告”[[73]](#footnote-73)。1970年的“达维农报告”确认了“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进行政治合作的原则。

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成为了检验“达维农报告”中的“高级政治”合作的有效案例。在中东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实际上对中东巴以冲突持有不同的态度，很难说“欧洲共同体”在“达维农报告”报告出台之前能够在外交政策上协调一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大幅减少原油产量，并且把出口的原油价格提高70%。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西欧各国经济面临重创，为此“欧洲共同体”迫切需要解决内部分歧，制定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1973年11月，“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宣布针对中东政策的统一立场，谴责以色列的占领行为。这是“欧洲共同体”首次就外交问题发表统一立场。在随后进行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谈”中，“欧洲共同体”再次确认了亲阿拉伯国家的统一政策立场，并强调“欧共同”将作为一个整体执行中东政策。联邦德国财政部部长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为了“欧洲共同体”政治团结的象征：“我们要求，在这场能源危机中，任何成员国决不能绕过自己周围的邻居单独出头。”[[74]](#footnote-74)

在此之后，“欧洲共同体”又于1979年开始实行了统一欧洲货币体系和货币单位，为欧洲“货币金融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1979年6月，欧洲议会首次选举，标志着“欧洲共同体”机构“国家化”又迈出了重要一步；1985年6月，“欧洲共同体”部分成员国签署了《申根协定》，宣布开始逐步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国家边界和边境控制；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宣布要推动“欧共体”向更紧密的政治联盟方向推进；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尽管在这期间，“欧洲一体化”进程也面临着诸多的挫折，但显而易见，成员国在一体化初期阶段的“安全信任”建立之后，“高级政治”合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问题。

**4.1.2.4 高密度且平等的经济交往**

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建立之后，成员国之间高密度，并且平等的交往也开始逐渐展开，进而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之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体现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信任建立之后对于双边和多边贸易额的促进作用。有相关研究显示，1959年“欧洲共同体”之间的贸易额相比较1958年而言增加了20%，在农产品贸易方面，1958年到1970年其贸易额增长了近6倍。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三国的贸易额增长了近1.5倍[[75]](#footnote-75)。在工业生产方面，“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安全信任”建立之后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表一）。这也表明“欧洲共同体”建立之后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表一：西欧六国工业生产总指数（不包括建筑业）[[76]](#footnote-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5** | **1956** | **1957**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 **比利时** | 99 | 105 | 105 | 104 | 112 | 119 | 125 |
| **荷兰** | / | / | / | 109 | 122 | 126 | 133 |
| **卢森堡** | 96 | 103 | 104 | 104 | 114 | 117 | 112 |
| **法国** | 82 | 89 | 96 | 101 | 110 | 116 | 122 |
| **联邦德国** | 86 | 93 | 97 | 107 | 120 | 127 | 133 |
| **意大利** | 84 | 90 | 96 | 111 | 128 | 142 | 156 |

“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也呈现出高密度和平等的特征。在阿格拉的研究中，他发现自1957年开始到1962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在进口贸易中呈现出相互依赖的态势，没有出现成员国之间不平等的贸易联系的情况（表二）[[77]](#footnote-77)。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综合实力经济略强的国家，从1957年开始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出口贸易中基本保持稳定，而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这三个综合实力略弱的国家在成员国之间的出口贸易表现上也基本保持类似，没有出现某个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在出口贸易中严重失衡的现象。

**表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进口贸易（占进口国进口总额的百分比）[[78]](#footnote-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 **荷兰** | 41.1% | 41.9% | 44.4% | 45.8% | 50.2% | 51.6% |
| **比利时、卢森堡** | 43.5% | 46.6% | 47.1% | 47.9% | 50.6% | 51.0% |
| **法国** | 21.4% | 21.9% | 26.8% | 29.4% | 31.5% | 33.6% |
| **联邦德国** | 23.5% | 25.8% | 29.0% | 29.9% | 31.3% | 32.5% |
| **意大利** | 21.4% | 21.4% | 26.7% | 27.7% | 29.5% | 31.2% |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农业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还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之中实现的飞跃，都是与“欧洲共同体”初期阶段成员国之间“安全信任”关系得到成功构建是分不开的。因为，在“欧洲共同体”的各项谈判中，所有成员国都做了很大的让步，有些让步甚至是以牺牲本国优势经济的前提下做出的。例如，“欧洲共同体”内部在在进行“共同关税”的谈判前，法国一直以来都在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以保证法国在农业方面的优势。但是为了“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同意将农业进口关税降低到其他成员国的同一水平。此外，联邦德国在1953年“经济共同体”建立之前就已经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单纯的经济逻辑上讲，加入到“经济共同体”资源接受一体化高级机构的贸易约束并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但是，联邦德国仍然接受了“经济共同体”的相关条款，自愿降低联邦德国作为一个单独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笔者认为，在“煤钢共同体”建立之后，成员国之间就开始形成了一种基于“安全信任”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成员国之间宁愿牺牲自己在经济上的核心利益和国家在经济命脉上的自主权，而参与到共同体的一体化建设之中，而不再担心共同体内的其他成员国利用一体化的条款伤害到本国的经济命脉。这是政治信任在经济合作中的反映。

**4.1.3 总结**

从以上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欧洲共同体”（特别是“煤钢共同体”）帮助成员国建立了“安全信任”关系。“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的建立，不仅消灭了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为所有成员国塑造了一个在安全上能够相互依赖的环境。当成员国之间不再相信其他成员国可能会在安全上给自己造成威胁时，包括安全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可能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平等沟通而得到解决。“安全信任”问题的建立导致了三个结果：一体化组织内部成员国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支持；“高级政治”议题的讨论与合作；以及平等和高密度的经济合作。这三个结果从不同的维度，又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共同体”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不断发展。这也是“欧洲共同体”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体化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最主要原因。

**4.2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前后（1949-1991）**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成立之初“经济互助委员会”只是一个主要由东欧国家组成的经济、政治以军事联合体。1962年该组织吸收蒙古民主主义共和国加盟，从而将其正式成员国拓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互助委员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一个成员国，并且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的一个一体化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所进行的一次经济以及科技合作的一体化尝试。和“欧洲共同体”类似，“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成立之初便遇到了挫折，成员国之间也围绕着主权的独立性以及一体化合作等议题产生了矛盾，但是这并不妨碍“经济互助委员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体化组织之一的地位。1985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了“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综合规划”，进行了超国家的社会主义一体化机构的尝试。尽管这次一体化尝试显得雄心勃勃，然而这次尝试并不成功，随着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经济互助委员会”名存实亡。1990年苏联失去了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控制，两德合并之后民主德国退出“经济互助委员会”。1991年6月28日，“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

**4.2.1 “经济互助委员会”失败的先天条件**

“经济互助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预示着其成员国无法建立一种相互信赖的安全合作关系。成员国之间相对破碎的地缘位置；成员国之间围绕着历史上深刻矛盾的持续相互怀疑；甚至成员国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不同理想上的深刻冲突，都在逐渐侵蚀着“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个由相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组建出来的国家联合体，也为“经济互助委员会”未来走向崩溃埋下了伏笔。

**4.2.1.1 相对碎裂的地缘区位**

成员国之间相对隔离的地缘区位不利于国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的安全关系。尽管“经济互助委员会”十一个成员国绝大部分都分布在欧洲大陆，但是该组织在地域上的无节制扩张使得“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几乎横跨了各个大洲（**附录E**）。这就意味着成员国之间无法形成一个在地缘上相互认同的共同体，在进行一些核心问题的集体决策时所涉及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同时，“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多数位于东欧，且多数国家国土面积狭小，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的国土面积过于庞大，且综合实力远超过其他成员国，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担来自苏联的安全压力[[79]](#footnote-79)。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政治民主化运动，同年8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军队使用了很短时间便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武力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与苏联这个控制欲很强的超级大国为邻，“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不得不在安全上提防苏联，不利于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

**4.2.1.2 惨痛的历史记忆**

战争一直伴随着东欧国家的历史记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东欧成为列强，特别是俄国争夺权力与资源的主要战场。俄罗斯民族早在沙皇时期就有着不少领土扩张的不良记录，而这一民族记忆，影响着东欧国家在对待俄罗斯时的态度[[80]](#footnote-8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了保证本国的安全利益，建立同西方军事大国之间的战争缓冲地带，并吞了大量东欧领土。随后又并吞了包括西乌克兰地区，西白俄罗斯地区，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地区，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地区等地区，并吞面积达48万平方公里。这一段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实际上会在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关系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此外，所谓“大俄罗斯”思想也深入到俄罗斯人的骨髓当中。在俄罗斯人看来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帝国”思想成为了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要发扬基督教文明，并且将虚幻腐朽的欧洲推翻[[81]](#footnote-81)。这种强烈的宗教选民逻辑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大规模扩张思想的基础，也在支撑着俄罗斯人不断寻求领土的拓展以及实现绝对的国家安全。这种侵略和被侵略的历史成了东欧国家寻求安全上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更为艰难。

**4.2.2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崩溃**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相对破碎的地缘区位；围绕历史问题而产生的龃龉；再加上成员国之间在共产主义理想上的矛盾导致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一一体化组织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构筑安全上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初期的各种举措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成员国之间在安全以及合作等问题上的不信任感，从而进一步导致了整个一体化合作体系的崩溃。

**4.2.2.1 安全不信任的起源**

一体化合作的初期阶段“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对一体化组织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与“欧洲共同体”不同，“经济互助委员会”最初成立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战略资源相互协调超国家机构，而是通过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和加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和扩张[[82]](#footnote-82)。事实上，从斯大林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之初的设想，有一部分原因是想将“经济互助委员会”建成一个类似于“共产主义情报局”的经济合作版本。19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情报局”主要目标是对外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在经济上也能通过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输出，那么苏联就能够实现对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控制，从而赢得被控制国家对苏联政策的支持。

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开始筹备之初，斯大林就不愿意构建一个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因为斯大林不愿意看到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反对苏联的情况发生。为了防止这一局面，斯大林不鼓励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这就在经济上切断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构筑相互信任的可能性。除了在经济上切断国家之间的联系之外，还密切注意“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分离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1968年所发生的苏联入侵布拉格事件，表明了苏联对其附属国受西方经济模式影响的担忧，也被视作捷克斯洛伐克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背叛[[83]](#footnote-83)。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早期的相互不信任，还反映在苏联利用一体化机构的活动原则强迫东欧成员国签订明显不平等的条约上。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次他与波兰领导人就出口到苏联的煤炭价格一事的争吵。在赫鲁晓夫访问华沙期间，波兰代表向赫鲁晓夫提到苏联强制压波兰低出口到苏联的煤炭价格。赫鲁晓夫事后认为，强迫波兰签订不平等的贸易条款是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可能觉得这（强迫东欧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二战中为他们流过血。他觉得他们（东欧国家）有义务以廉价的煤炭来报答我们。”[[84]](#footnote-84)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之初，所以统一、平等的贸易政策就被苏联架空，并且还利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名义维护苏联的利益[[85]](#footnote-85)。

事实上，“经济互助委员会”在一体化初期阶段成立的目的上，同“欧洲共同体”相比有很大的不同。1957年“欧洲共同体”最初的六个成员国最初同意组建一个一体化组织的目的是统筹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防范欧洲国家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从最开始就没有像建立一个等级体系，用实力迫使其他成员国服从另一部分成员国，并且“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有着共同的经济意识形态。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平衡美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而做出的一个权宜之计，苏联控制着这个一体化组织的一切，组织内的成员国对苏联既恐惧又憎恨，而且在经济上，苏联与其他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问题上有着迥异的态度。这些矛盾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进程开始启动的初期就为之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4.2.2.2 社会公众及各国政府的怀疑**

从“经济互助委员会”开始筹备之初，就今后的发展埋下相互猜疑的种子，也为一体化后期的发展制造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其中就包括各成员国对苏联这个“经济互助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国的深刻怀疑。

苏联积极推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发展，并非是处于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是想把“经济互助委员会”作为一个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苏联由于国土面积庞大，资源丰富，而且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因此相比较其他东欧国家，更加具有独立性，对一体化的需求更少。苏联希望借助这样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达到控制东欧各成员国，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欧集团的目的。最突出的表现是，1962年苏联吸收来了蒙古民主主义共和国正式加入到“经济互助委员会”，在1972年和1978年勃烈日涅夫又分别吸收了古巴和越南加入到“经济互助委员会”组织。在这期间，苏联还邀请了一些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观察员国。大量无节制地吸收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无助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发展，苏联之所以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国主要是因为苏联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制成品，并且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国达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为苏联大量援助欧洲区域外的其他国家这一做法辩护：

“*自然，我们乐于有机会支持我们朋友们的经济。并从而加强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但是，这只是政治上的考量，同时我们也得计算一下，不要白白花掉我们的资金。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被援助的国家）能够长期定期提供他们的长纤维棉花、优质的大米以及其他物资，来偿还我们的投资。然而我们不愿意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帮助他们是基于一种牟利的动机。绝不是这样。我们关心政治甚于关心经济。……我们知道，加强同他们的关系，就是在削弱敌人的阵营。*”[[86]](#footnote-86)

“经济互助委员会”最初的东欧成员国对苏联在一体化开始启动的阶段就不断扩大委员会成员国数量和地域范围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甚至对苏联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不满，他们不愿意仅仅因为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而为吸收更多的欠发达国家进入到“经济互助委员会”当中，从而迫使他们承担更多的经济和决策成本[[87]](#footnote-87)。

除了对苏联无节制地扩大成员国范围之外，苏联还与罗马尼亚就是否建立“超国家机构”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认为，为了促进“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工业计划的协调和专业化分工，必须赋予“经互会”以超国家的权力。而代表东欧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罗马尼亚认为，苏联的这一主张侵犯了各个成员国的主权。由于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东欧国家，对赫鲁晓夫设立超国家机构来管理各国工业生产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所以，实际上苏联逐渐扮演了一个超越各个成员国的“超国家机构”的角色。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苏联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联盟[[88]](#footnote-88)。苏联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初期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导致了各成员国对苏联的怀疑，而这也对未来一体化的人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4.2.2.3 “经济互助委员会”合作中“高级政治”议题的流产**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初期“安全信任”关系构建的失败所导致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经济互助委员会”不仅无法在“低级政治”方面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在“高级政治”合作领域更是无法取得任何突破。

事实上，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平等的决策机制，成员国之间仍然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之初，并没有设置一个中枢机构，名义上的一体化委员会实际上也无法促使各个成员国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也无法做出任何具体有约束力的决定，它只能为成员国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也被各成员国根据本国自己的利益而随意进行解释。此外，“经济互助委员会”也缺乏一个执行秘书，使得这个组织无法统筹各个系统的决策。整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决策系统显得虚弱不堪[[89]](#footnote-89)。这就使得“经济互助委员会”几乎无法在“高级政治”一体上达成一份各个成员国都自愿接受的协议。直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才正式以文件的方式提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要构建一种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关系。即便如此，苏联也很快破坏了这个宣言所规定条文。

尽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之后意识到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对成员国严厉限制的负面作用，开始放松了对成员国的控制，但是作用并不明显。斯大林留下的是一个僵化且等级森严的一体化组织。这就注定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努力的最终失败。

**4.2.2.4 不对称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在安全上的不信任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成员国之间日益扭曲的经贸和政治关系。

“经济互助委员会”在1957年发布了“莫斯科宣言”，以及又在1959年-1960年修订颁布了《国际社会主义劳务分工的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原则》”）。这些文件尽管明确规定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贸易上的平等地位，但事实上苏联凭借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优势，“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仍存在着非常森严的等级制度，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地位并不平等。以罗马尼亚为例，罗马尼亚是《原则》等级制度的受害者。根据《原则》中所规定的有关所谓“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具体条款，罗马尼亚将会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国际贸易中沦为工业原材料的二、三级供应商，为苏联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能源和资源。在这样一个经济的等级体系下，罗马尼亚逐渐对自己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感到非常不满，整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经济一体化方针都面临着冲击和挑战[[90]](#footnote-90)。

不仅在经济上，实际上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扭曲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苏联为了维持“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在政治上事实的等级制度，长期在这些国家保持着军事存在。这些国家与苏联在军事、政治上的差距巨大，因此对苏联在其本国内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敢怒而不敢言。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次他与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波德纳拉希的对话。波德纳拉希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试探性地询问苏联能否有可能将苏联军队撤出罗马尼亚。这是一次没有进行任何事先沟通的对话，赫鲁晓夫对波德纳拉希突然提出这一问题大为恼火，并且认为罗马尼亚方面在此问题上“蓄谋已久”。波德纳拉希显然没有料到赫鲁晓夫这个问题的反应会如此之大，只能向赫鲁晓夫表示罗马尼亚始终忠于社会主义，并且希望苏联成为包括罗马尼亚人民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赫鲁晓夫对波德纳拉希的回答很满意，“他们这样阐述要苏军从罗马尼亚撤出的理由，我是再满意不过了。我也相信罗马尼亚的同志重申忠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是陈恳的。”[[91]](#footnote-91)可见，尽管“经济互助委员会”各成员国维持着紧密的政治军事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不对称的。成员国之间事实上的等级或附属关系，使得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构建几乎不可能。

尽管苏联在此之后放松了对成员国的经济控制，尝试着允许成员国在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就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并且也开始逐步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减少驻军规模。但是随后而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断了这种改革气氛，苏联进一步加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等级制度。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组织内部，任何政治或经济的改革都不被允许。“勃烈日涅夫主义”出台之后，“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在《莫斯科宣言》中所声称的“成员国之间地位平等”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4.2.3 总结**

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初期，苏联与其他成员国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在安全方面的矛盾更显突出。由于东欧各国无法真正确定苏联积极推进“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进程的最终目标，所以成员国之间始终无法建立一种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相互信任并且在安全上相互依赖的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苏联无法就“经济互助委员会”一体化发展问题上赢得其他成员国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的广泛支持。并且，由于成员国就安全问题上存在广泛担忧，任何细小的经济社会问题都有可能会引发成员国在安全上的不安，“经济互助委员会”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超国家高级机构。最后，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不信任，也导致了成员国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困境，而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方面的不平衡，又进一步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感。“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成员国之间“安全信任”关系的建构实际上为该组织日后走向崩溃埋下了伏笔。

**第五章 结论：“高级政治”为导向的“区域一体化”实践**

“区域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一个新趋势，它要求成员国让渡自身的部分主权给一个超国家机构，由超国家机构制定共同需要遵守的政策。“区域一体化”是国家间进行合作的高级形式，是国家间关系走向所谓“康德文化”的重要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诸多“区域一体化”组织，这表明石阶上大部门国家都意识到了“区域一体化”合作的重要意义，那么更加深入了解“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机制，特别是研究不同“区域一体化”组织在推进一体化合作进程中所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至关重要。

在所有“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实践研究中，一个被人们广泛忽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欧洲共同体”要从“煤炭钢铁一体化”和“原子能一体化”起步，而不是率先从所谓“低级政治”合作领域取得突破？“欧洲煤钢一体化”以及“原子能一体化”合作究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从这两个问题着手，笔者认为“煤炭钢铁一体化”和“原子能一体化”是国家建立“高级政治”合作的一种努力，当这种“高级政治”合作被广泛接受之后，“安全信任”关系也得到巩固和建立，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共同体”在推进其一体化过程中能取得突破，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深，最为成功的一体化组织的原因。

同时，由上述“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构建努力中我们也能看出，“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在一体化组织建立的早期作用更加至关重要。现代社会心理学已经证明，过去活动的“经验”和“学习”会对人们以后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笔者认为，一体化进程早期的“安全信任”关系的构建会影响成员国之间相互的合作态度，同时也会深刻影响一体化组织成员国在某些“高级政治”议题上的合作。“安全信任”得到建立之后，通过影响成员国之间的情感相互认知，以及各个成员国就“高级政治”领域进行合作的态度，最终实现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那么一体化组织的各个成员国该如何在一体化进程的早期构建“安全信任”关系呢？笔者认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在合作的早期阶段中，应该更加“大胆”，在早期的合作中就应该涉及“高级政治”方面的 合作，并把“高级政治”领域上的合作摆在突出位置。只有在一体化组织内的各个成员国在一体化合作中的“高级政治”上取得了突破，才能在“低级政治”合作领域中上取得更快的进展；当“低级政治”领域合作取得快速突破之后，成员国国内舆论和情感就会往合作的方向靠近。

科学理论最大的特征在于，科学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它不会因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基于“安全信任”构建的一体化进程理论研究是一项科学的研究，因此它的假设和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对于普适性的一体化组织而言，要想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继续发展，建立一个紧密团结且富有效率的一体化组织，基于“安全信任”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可以尝试实行以下几个战略：

第一，有限成员战略。根据文章的论证，盲目扩大“区域一体化”组织员国数量并不能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进程，特别是要慎重考虑跨地区、跨文化的“区域一体化”尝试。文章已经证明，跨地区、跨文化的“区域一体化”不仅会损害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和团结，同时还会增加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成本，不利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

第二，渐进式合作战略。对于跨地区、跨文化的“区域一体化”尝试，由于这类国家之间缺乏信任的基础，特别是在安全上缺乏“共同体”意识，因此这类国家在进行“区域一体化”的尝试时首要的任务不是进行“超国家”机构的设计，而是扩大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建立国家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只有当“信任”特别是涉及到相互安全领域的“安全信任”得到建立之后，未来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会取得成功。

第三，“高级政治”合作优先战略。对于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的国家来说，“区域一体化”的尝试不应该在“低级政治”合作领域中耗费太多的精力，而是应该力图在“高级政治”合作领域首先取得突破，从而为“区域一体化”未来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安全信任”基础，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向前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所研究的是一体化组织发展的初期阶段过程中，“安全信任”是如何影响后续一体化合作的。因此，文章并不试图回答某一个一体化组织发展的未来，而是试图通过相异案例的比较，来理解一体化进程中的某个历史阶段发展的特征。本课题也不试图回答现阶段“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信任困境”[[92]](#footnote-92)。因为本课题研究所集中的研究时间区间是一体化组织成立的早期阶段，笔者试图通过相异案例的研究得出一体化早期的“安全信任”关系构建对于“区域一体化”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欧洲共同体”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尽管“欧洲共同体”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面临着不少挫折，但是“欧洲共同体”仍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即便现阶段“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由于其成员国之间所建立的稳固的“安全信任”关系，使得“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无论其是在发展的程度上还是成员国进行合作的程度上，比其他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都要深入得多。

致谢

终于到了最后。还记得踏入到校园的第一天，我就曾经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要给自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时间飞快，回头看看自己的誓言，这一切仿佛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虚幻、缥缈。

三年以前，我和同龄人一样，对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对未来无限多的可能有着憧憬。还记得入学前，师门聚会，我意气风发，想要珍惜在同济的每一天，在自己毕业的时候能做出一番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确实，我做到了自己从来没有想象得到的一些事情，尽管走的不太完美，但总算给父母、给同济、给自己一个还算满意的交待。

在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是在读书中成长的。在本科期间有幸遇到几位非常出色的老师，使他们是我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也是他们让我对思考人类最终极问题保持了长久的兴趣，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继续深造的原因。四年以来的苦读，我认识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波普尔，我发誓自己将效仿他们为这个世界做出点微小的贡献。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我读了很多遍，主要原因是这本小册子着实艰深晦涩，但是在字里行间我跨过了千年，我仿佛感受到了在某个寒冷的夜晚，康德在昏黄的烛火下对人类未来所真诚许下的愿。“战争之害，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消灭的坏人更多”。我被他感动了，人类社会不应该被族群、低于甚至主权所阻隔，每个人都是人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杀戮、迫害、诅咒这类应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不应该在当今人类社会还占有一席之地。我开始把目光转向欧洲，一块摒弃了偏见和仇恨的古老大陆。有的人为了消灭战争带来的仇恨甘愿为真理献身，有的人为了真理甘愿背负千年的骂名。总有人要做一些工作，为了眼前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虽然最后被分配的导师学习领域不是欧盟，但是自己去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关注欧盟，关注欧洲的发展。一年级的课程安排很紧凑，同窗们的学习热情也深刻地感染到了我。在这一年中，我结识了生活和学习上战友，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跟老师“斗智斗勇”，一起见证了这个社会的冷暖。二年级的时候，有幸参加了同济-ULB的双硕士学位项目，拿到了ULB攻读硕士学位的offer。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我总与能够以自己的眼睛去体会欧洲社会的发展。为此我放弃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奖学金交换项目。在布鲁塞尔的一年，是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受益最多的一段时光，我学习了欧盟法，了解了欧洲的运作方式，同时也看到了欧盟现阶段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在布鲁塞尔求学的后期，我逐渐感觉到了学术的压力，并且我觉得我现在所学习到的研究方法不足以使我在认识人类社会的道路上走的更远，于是我选择了放弃。我希望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一另外一种方式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微小的贡献。2015年的8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并且以优异成绩获得了ULB政治科学硕士。之后，我便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面，因为我想给自己的学生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以上这些流水账似的的语言无以表达我对过去这三年多，甚至更久远的时间的无比怀念。

首先，感谢章仁彪老师，感谢您在课上及课下对我的谆谆教诲，我至今仍然不能忘记2015年布鲁塞尔的那个夏天，在那个如此难忘的场合下跨越半个地球的握手，现在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感谢王传兴、陆伟和钟振明老师，在你们的课上我读了大量的文献，也是你们是我懂得了如何开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说没有你们的教诲，这篇毕业论文凭我之前粗浅的功力是没有办法驾驭的了的。感谢刘谦老师、仇华飞老师和杨晔老师，我现在耿然不能忘记刘谦老师在课上诙谐的语言；仇华飞老师对学术文章的认真严谨；以及杨晔老师对研究问题的深刻洞见，你们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感谢陈竞老师和张俊薇老师在我攻读硕士期间的各种帮助，没有你的帮助我没有办法走到今天。同时也感谢霍普金斯大学的Andersen教授，以及众多我忘记了名字的外籍教授和讲者，在这个国际化的学术舞台上我获益匪浅。感谢我的导师原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老师，以及我的同门师兄弟们，特别是孔祥明师兄、孙兆岩和范笑天，没有你们的帮助和陪伴料想我也无法熬过那一个个黑暗的日日夜夜。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François Foret教授。丝毫不隐瞒地说，此篇论文的最初框架及后续的研究安排，François教授提出了非常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的一些建议至今也深刻地影响着我。愿François教授在遥远的布鲁塞尔一切都好。还要感谢Caroline女士和冯源博士对我在布鲁塞尔求学期间的热情友好帮助。

我还要感谢门洪华老师和王存刚老师对我在学术末尾阶段的严格要求。两位老师在学界上可以称得当是“久负盛名”，很遗憾没能够聆听两位老师的授课。在我论文的成稿期间，两位老师对论文的严格要求也成为了我努力要把论文完成、做好的动力。我也会将两位老师踏实严谨的工作和学术态度带到我以后的工作岗位当中，做一个踏实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最后，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百忙之中对我论文的审阅。

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没有继续在学术的舞台上继续发展，这也许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不管怎样，愿世间所有的梦想和善意都能够被以温柔相待。

2017年3月1日

于 同济经管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Andrew.H.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 1992: 55-76

[3] Anne-Marie Burley & Walter Mattli, Europe before the Court: A Political Theory of Leg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3, Vol.47 (1): 41-76

[4] Charles.G.Nelson, European Integration: Trade Data and Measure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74, Vol.28 (3): 399-433

[5] Christopher Tugendhat. Making Sense of Europ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6

[6] Daniel Gros & Niel Thygesen, Towards Monetary Un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Why and How?. Rivista International di Scienze Sociali, 1991, Anno 99 (1): 69-91

[7] Desmond Dina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78-93.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an. 1994, Vol.531: 10-24

[8] Elena Dragomir. The Cre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as seen from Romanian Archives. 2014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arch, May 2015. Vol. 88 (240)

[9] Enrico Spolaore, What is European Integration Really About? A Political Guide for Economis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ummer 2013, Vol.27 (3): 125-144

[10] Ernst.B.Haas & Phi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64, Vol. 18 (4): 705-737

[11] Ernst.B.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61, Vol. 15(3): 366-392

[12] H.Field Haviland, Jr., Building a Politic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63, Vol. 17 (3): 733-752

[13] J.H.H.Weil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The Yale Law Journal, Jun. 1991, Vol.100 (8): 2403-2483

[14] J.S.Nye, Comparing Common Markets: A Revised Neo-Functionalist Mod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70, Vol.24 (4): 796-835

[15] Jan J.Schokking, Observations on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re-1986), Dec 1960, Vol.4 (4): 385-410

[16] JÓZEF NIŻNIK,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No.132: 387-395

[17] Matthew Gabel & Guy D. Whitten, Economic Conditions, Economic Perception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997, Vol.191(1): pp.81-96

[18] Matthew J.Gabe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ass Politics: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ur. 1998, Vol.42 (3): 936-953

[19] Neil Fligstein, Alina Polyakova & Wayne Sandholtz, European Integration, Nationalism and European Identit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2, Vol.50 (S1): 106-122

[20] Olivier Costa & Nathalie Brack. How the EU Really Work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21] Peter Cocks,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80, Vol.34 (1): 1-40

[22] Philippe C.Schmitter, A Revise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70, Vol.24 (4): 836-868

[23] Richard C.Eichenberg & Russell J. Dalton, Europeans and European Community: The Dynamics of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3, Vol.47 (4): 507-534

[24] Richard W.Van Wagenen,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 Review.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re-1986), Dec 1965, Vol.9 (4): 526-531

[25] Ronald Inglehart & Jacques-René Rabier,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European Solidarity: Public Opinion Trend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 1978, Vol.440,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fter Twenty Years: 66-97

[26] Ronald Inglehart, Public Opin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70, Vol.24 (4): 764-795

[27] Sylke Nissen, The Eurobarometer and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Weaknesses of the Largest European Survey. Qual Quant, 2014, No.48: 713-727

[28]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Comecon Data 1990.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1

[29] William E. Fisher, An Analysis of the Deutsch Sociocausal Paradigm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69, Vol.23 (2): 254-290

[30] William V. Wallance &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6

[31] Douglas Webber. The France-German Relation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32]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33] John Gillingham. Coal, Steel, and the Rebirth of Europe, 1945-1955: The Germans and French from Ruhr Conflict to Economic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 John Gillingham. European Integration, 1950-2003: Super-state or New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5]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36] （美）理查德•辛诺特. 关于一体化的理论与欧洲数据库的一体化.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5年第4期: 49-57

[37] （墨）何塞•阿方索•莫雷拉斯. 国际经济谈判年表（1944-1981）. 国际经济评论，1982年第5期: 78-80

[38] （德）维尔纳•魏登费尔德，约瑟夫•杨宁. 冷战后的欧洲一体化——新秩序的前景.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3年第1期: 83-93

[39] 程极明. 巨大深刻的变化：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1期: 2-7

[40] 郭韬杰. 战后欧洲一体化理论. 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0期: 40-43

[41] 郭小安. 舆论的寡头化铁律：“沉默的螺旋”理论使用边界的再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15

[42] 郭振家. 美国的介入和亚洲一体化——基于欧盟创立及发展历程的反思. 太平洋学报，2014年2月: 42-51

[43] 房乐宪. 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功能主义. 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0期: 34-38

[44] 何奇松. 欧盟防务一体化的最初尝试：欧洲防务共同体. 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105-113

[45] 惠一鸣. 论欧洲一体化运动发生发展到基本历史动因. 史学集刊, 2000年2月第1期: 66-71

[46] 贾文华. 从资本逻辑到生产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解释.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44-51

[47] 蒋红柳，石坚.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宗教因素. 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 57-61

[48] 李明明. 建构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探析. 欧洲研究， 2003年第3期: 48-58

[49] 李明明. 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欧洲研究, 2009年第4期: 33-45

[50] 李明明. 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进程. 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31-38

[51] 李少军. 论国际安全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年第10期: 44-55

[52] 李铁立. 边界转型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机制. 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 15-26

[53] 刘文秀. 欧盟国家主权让渡的特点、影响及理论思考.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 23-28

[54] 刘颖. 论一体化进程研究中的“奈模型”. 新疆社科论坛，2005年第3期: 12-17

[55] 罗志刚. 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原则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2卷(2): 230-235

[56] 马风书，任娜. 欧洲一体化——一种文化的解读. 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 28-34

[57] 欧洲共同体官方出版局. 欧洲联盟条约.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9

[58] 邱芝. 欧盟一体化发展的溢出效应.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1期: 12-15

[59] 宋新宁. 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观察, 2004年第5期: 1-10

[60] 史晓东. 文化认同——欧洲一体化的隐性动力.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第3期: 54-57

[61] 谭华. 主权国家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测量综述. 嘉兴学院学报, 2011年7月第23卷(4): 100-104

[62] 唐小松，黄忠.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观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解读. 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 77-81

[63] 唐宣红，王微微. 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2007年第2期: 29-33

[64] 王存刚. 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 外交评论, 2012年第2期: 1-18

[65] 王绳祖. 国际条约集（1950-1952）.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66] 王学东. 新制度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述评. 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 81-91

[67] 王展鹏. 理性选择还是社会建构——欧洲一体化理论范式之争评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2期: 118-124

[68] 吴友法，梁瑞平. 德法和解是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基石.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55卷(5): 599-606

[69] 伍贻康. 法德轴心与欧洲一体化. 欧洲，1996年第1期: 34-42

[70] 吴志成，王杨，焦越.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饭一体化”分析. 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3-31

[71] 岳伟. 战后鲁尔问题与西欧早期一体化.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8年第61卷(3): 342-346

[72] 周士新. 浅析东盟地区论坛的信任建立措施. 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1年第3期: 1-6

[73] 张健. 萨尔问题的解决与西欧早期一体化.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55卷(1): 32-39

[74] 张曙光，张胜军. 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自由政府间主义. 国际论坛，2011年第11卷(3): 60-64

[75] 张旭鹏. 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 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 66-77

[76] 张颜语. 跨国社会调查的典范“欧洲晴雨表”. 中国社会学科学报，2009年7月30日(8)

[77] 窦艳洁. 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前景分析: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吉林大学，2012

[78] 和春红. 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山东大学，2012

[79] 李莉. 马歇尔计划与早期欧洲一体化进程: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3

[80] 李默. 浅析欧洲一体化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吉林大学，2013

[81] 卢志渊. 市场缺失与冷战时期的经互会: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82] 马晓旭. 以条约为视角解析欧洲一体化: [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外交学院，2013

[83] （美）海伦•米尔纳. 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84] （苏）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 上海:东方出版社, 1988

[85] （苏）赫鲁晓夫.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 上海:东方出版社, 1988

[86] 钱进. 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动因、困境及前景探析: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吉林大学，2011

[87] 田青. 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与经验实证: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浙江大学，2004

[88] 王娟.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争论与阻力研究（1950-1992）: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89] 王新影. 欧盟对外援助与欧洲一体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

[90] 吴玮丽. 中东欧国家经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关系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复旦大学, 2010

[91] 尹继武. 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92] 肖洋. 建立信任措施实践研究——兼论堆中国海洋安全的启示: [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外交学院，2011

[93] 许艳民. 五十年代初期西欧联合的再探讨——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功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看西欧联合: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

[94] 张海伟. 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2012

[95] 张海洋. 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研究——历史沿革、机制运行与案例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96] 朱晓军. 欧盟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实证研究——基于边界效应的视角: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复旦大学, 2008

[97] （美）罗伯特•殷.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中文第2版）.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98] （美）安德鲁•莫劳夫科奇. 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上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99] （美）A. M. 阿格拉. 欧洲共同体经济学.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100]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index\_en.htm

[10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附录A “欧共体”与“经互会”各成员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960-1990）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吨）[[93]](#footnote-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0**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 **1985** | **1990** |
| **荷兰** | 6.399 | 8.174 | 10.886 | 11.197 | 12.545 | 10.209 | 10.594 |
| **比利时** | 9.942 | 11.142 | 13.01 | 12.458 | 13.723 | 10.597 | 10.64 |
| **卢森堡** | 36.685 | 36.814 | 40.533 | 32.997 | 30.281 | 25 | 26.198 |
| **联邦德国**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 **法国** | 5.794 | 7.034 | 8.437 | 8.238 | 9.132 | 7.058 | 6.42 |
| **意大利** | 2.178 | 3.642 | 5.513 | 6.174 | 6.892 | 6.576 | 7.362 |
| **英国** | 11.51 | 11.456 | 11.732 | 10.736 | 10.287 | 9.9 | 9.711 |
| **丹麦** | 6.503 | 9.317 | 12.6 | 11.024 | 11.784 | 11.747 | 9.771 |
| **爱尔兰** | 3.953 | 4.773 | 6.565 | 6.917 | 7.693 | 7.557 | 8.891 |
| **希腊** | 1.129 | 1.991 | 2.748 | 4.297 | 5.334 | 6.1 | 7.285 |
| **葡萄牙** | 0.929 | 1.289 | 1.758 | 2.349 | 2.763 | 2.734 | 4.239 |
| **西班牙** | 1.607 | 2.226 | 3.458 | 5.112 | 5.743 | 5.238 | 5.627 |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吨）[[94]](#footnote-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0**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 **1985** | **1990** |
| **苏联**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 **民主德国**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 **罗马尼亚** | 2.904 | 4.136 | 5.931 | 7.62 | 8.84 | 8.541 | 6.847 |
| **捷克\***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N/A |
| **保加利亚** | 2.834 | 5.646 | 7.213 | 8.378 | 8.744 | 9.993 | 8.69 |
| **波兰** | 6.74 | 7.862 | 9.32 | 11.041 | 13.059 | 11.986 | 9.667 |
| **阿尔巴尼亚** | 1.258 | 1.166 | 1.753 | 1.911 | 1.935 | 2.658 | 1.616 |
| **匈牙利** | 4.544 | 6.04 | 6.771 | 7.152 | 8.109 | 8.086 | 6.71 |
| **古巴** | 1.918 | 1.837 | 2.143 | 2.868 | 3.193 | 3.231 | 3.165 |
| **蒙古** | 1.355 | 1.769 | 2.228 | 2.748 | 4.071 | 4.698 | 4.573 |
| **越南** | 0.216 | 0.343 | 0.66 | 0.454 | 0.313 | 0.36 | 0.3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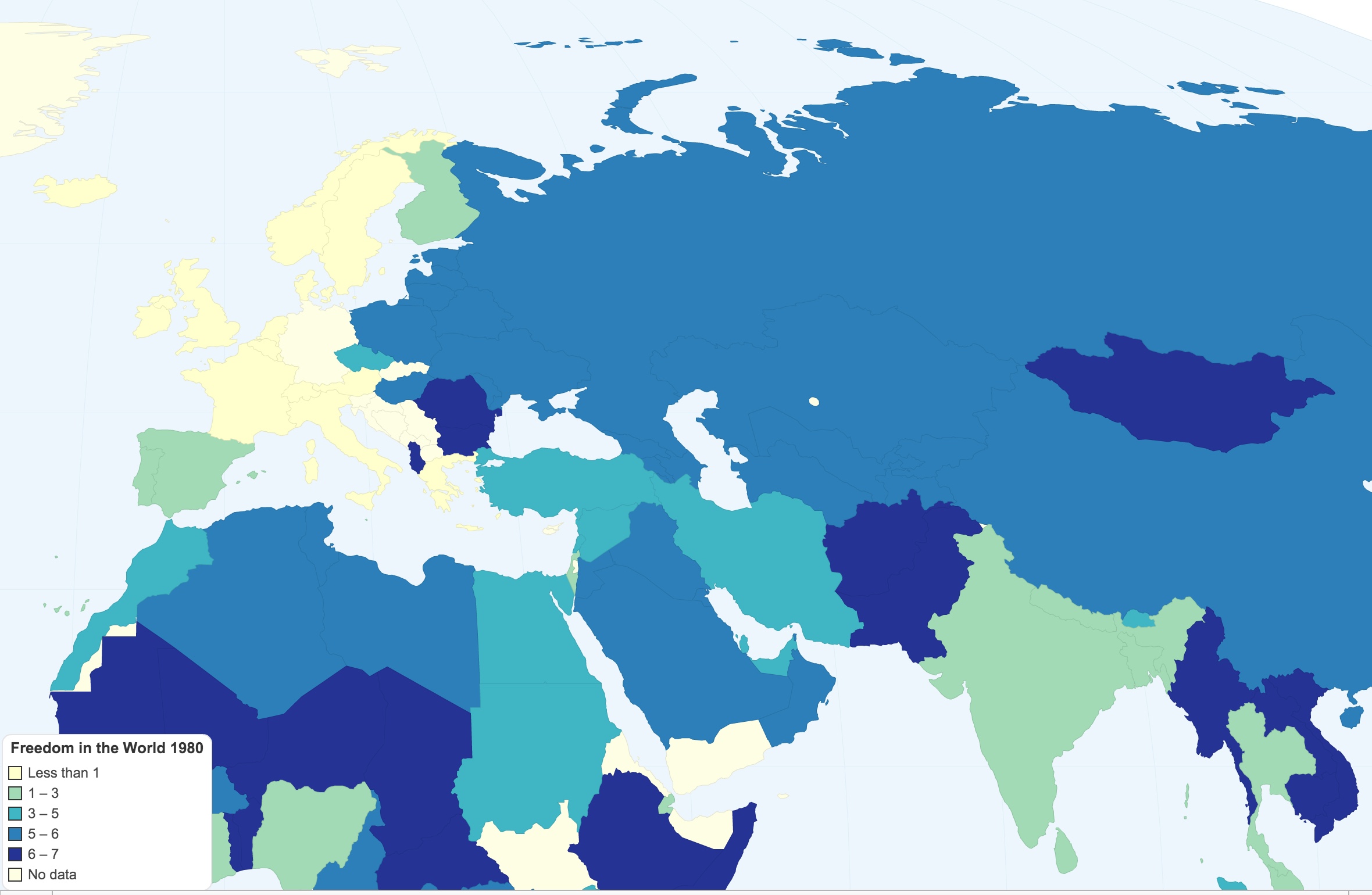
附录B “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百分比（1970-1990）

**“经互会”各主要成员国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百分[[95]](#footnote-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匈牙利** | **波兰** | **罗马尼亚** | **苏联** | **保加利亚** | **捷克斯洛伐克** | **民主德国** |
| **1970** | 62.34% | 60.61% | 50.30% | 54.35% | 77.43% | 64.68% | 68.64% |
| **1975** | 68.53% | 56.95% | 38.80% | 55.60% | 77.63% | 66.50% | 96.86% |
| **1980** | 51.47% | 53.26% | 38.58% | 49.04% | 68.83% | 65.15% | 65.44% |
| **1985** | 53.65% | 48.76% | N/A | 55.36% | 75.75% | 72.06% | 62.68% |
| **1990** | 31.93% | 22.59% | N/A | 49.75% | 80.88% | 43.42% | N/A |

附录C Freedom House年度人权报告（1980）

**Freedom House年度报告（1980）[[96]](#footnote-96)**



附录D “欧共体”与“经互会”成员国的宗教信仰分布

**“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主要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97]](#footnote-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穆斯林** | **东正教** | **罗马天主教** | **其他天主教** | **东方宗教** |
| **荷兰** | 5.8% | \ | 30% | 20% | \ |
| **比利时** | \ | \ | 75% | \ | \ |
| **卢森堡** | \ | \ | 87% | \ | \ |
| **联邦德国\*** | 3.7% | \ | 34% | 34% | \ |
| **法国** | 5%-10% | \ | 83%-85% | 3% | \ |
| **意大利** | \ | \ | 90% | \ | \ |
| **英国** | 2.7% | \ | \ | 71.6% | \ |
| **丹麦** | 2% | \ | 3% | 95% | \ |
| **爱尔兰** | \ | \ | 87.4% | 2.9% | \ |
| **希腊** | 1.3% | 98% | \ | \ | \ |
| **葡萄牙** | \ | \ | 84.5% | 2.2% | \ |
| **西班牙** | \ | \ | 94% | \ | \ |

\* 笔者认为，宗教信仰同其他各式文化传统一样，具有一定的惯性，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显著改变。因此，笔者认为统计数据中的“德国”宗教信仰的分布，不会因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而发生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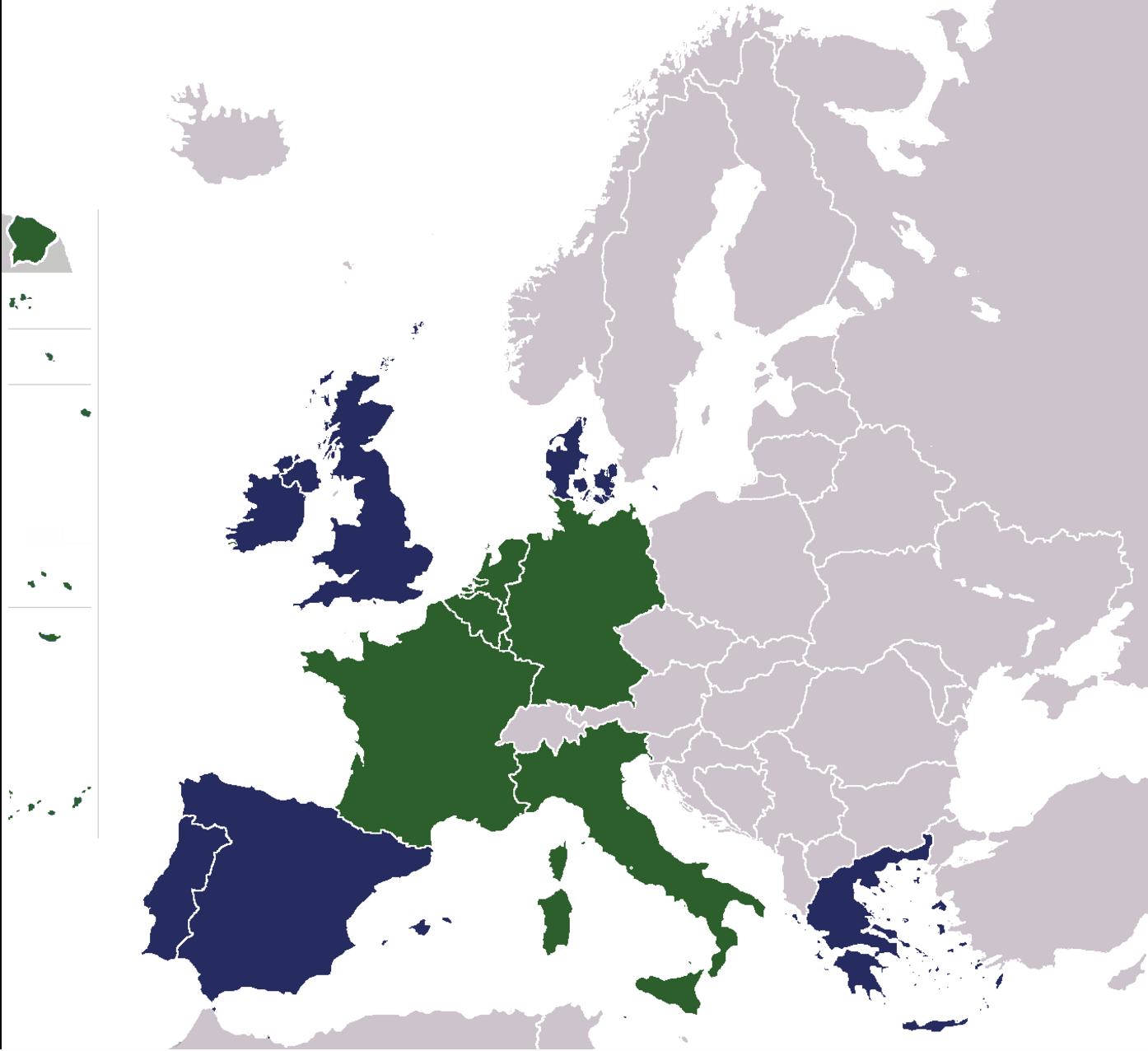
**“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主要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

**“经济互助委员会”各成员国主要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98]](#footnote-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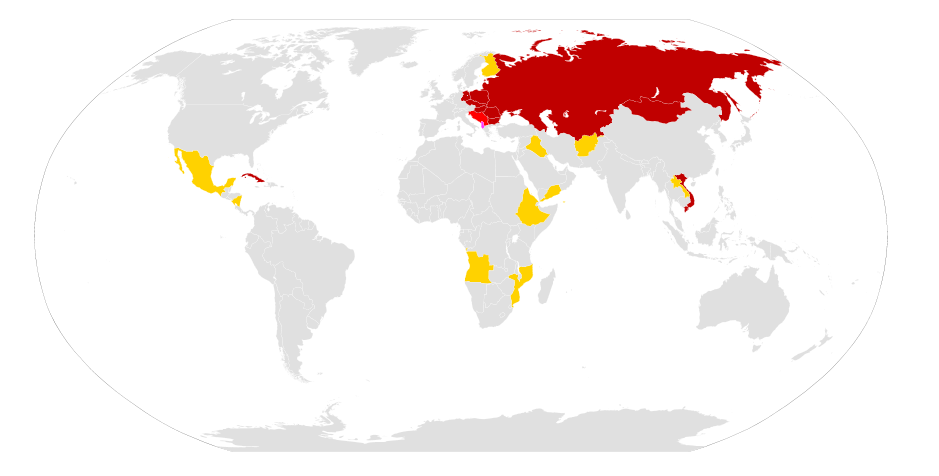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穆斯林** | **东正教** | **罗马天主教** | **其他天主教** | **东方宗教** |
| **苏联** | 10%-15% | 15%-20% | \ | 2% | \ |
| **民主德国** | 3.7% | \ | 34% | 34% | \ |
| **罗马尼亚** | 0.9% | 86.8% | 4.7% | 7.5% | \ |
| **斯洛伐克\*** | \ | 4.1% | 68.9% | 10.8% | \ |
| **捷克** | \ | \ | 26.8% | 2.1% | \ |
| **保加利亚** | 12.2% | 82.6% | 1.2% | \ | \ |
| **波兰** | \ | 1.3% | 89.8% | 0.3% | \ |
| **阿尔巴尼亚** | 70% | 20% | 10% | \ | \ |
| **匈牙利** | \ | 54.5% | 18.9% | 19.9% | \ |
| **古巴** | \ | \ | 85% | \ | \ |
| **蒙古** | 4% | \ | 6% | \ | 56% |
| **越南** | 0.1% | \ | 6.7% | 0.5% | 11.9% |

附录E “欧共体”与“经互会”的成员国

**“欧洲共同体”的创始国与成员国**[[99]](#footnote-99)



**图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1985年）[[100]](#footnote-100)**



1. Christopher Tugendhat, Making Sense of Europe, Viking Press, 1986, p36. [↑](#footnote-ref-1)
2.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第331页。 [↑](#footnote-ref-2)
3. Ernst B. Haas & Phi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64, Vol. 18, No. 4, pp. 705-737. [↑](#footnote-ref-3)
4. Kar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 [↑](#footnote-ref-4)
5. Ernst B. Hass & Phi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64, Vol.18, No.4, PP.705-737. [↑](#footnote-ref-5)
6. Ernst B. Has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63, Vol.17, No.3, The Atlantic Community: Process and Prospects, PP.733-752. [↑](#footnote-ref-6)
7. J. S Nye, Comparing Common Markets: A Revised Neo-Functionalist Mod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70, Vol.24, No.4,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Search, PP.796-835. [↑](#footnote-ref-7)
8. 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footnote-ref-8)
9.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水平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进口贸易额方面，大多数成员国甚至在1986年前后就开始出现了显著下滑。数据来自于Comecon Data 1990. [↑](#footnote-ref-9)
10. 成员国之间的“同质性”在这里是指成员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记忆等各项指标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footnote-ref-10)
11. Gary King, Robert Keohan &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81-82. [↑](#footnote-ref-11)
12. 海伦 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0月，译者序第10页。 [↑](#footnote-ref-12)
13. 所谓“单元的同质性”（unit homogeneity）是指，当自变量取特定值时，作为每个单元的因变量也会随之发生同方向，或不同方向的变化。参见：Gary King, Robert Keohan &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91-115. [↑](#footnote-ref-13)
14. Alexander George &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5, pp.151. [↑](#footnote-ref-14)
15. 海伦 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0月，译者序第11页。 [↑](#footnote-ref-15)
16. Charles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37. [↑](#footnote-ref-16)
17. 这里所说的成员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地理区位的相似性是相对于“欧洲共同体”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建立之初时，成员国之间的发展状况来说的。但是，由于宗教信仰以及地理区位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更具持久性，这就意味着在本课题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在宗教信仰及地理区位的数据收集上，不比考虑时间的因素。可以就近进行数据的收集工作。 [↑](#footnote-ref-17)
18. Olivier Costa & Nathalie Brack, How the EU really Work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14-15. [↑](#footnote-ref-18)
19. Elena Dragomir, The Creation of 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as seen from the Romanian Archives, 2014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88, No. 240 (May 2015). [↑](#footnote-ref-19)
20.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 University of Zurich, 19 September 1946. 转引自http://http://europa.eu/about-eu/eu-history/founding-fathers/pdf/winston\_churchill\_en.pdf [↑](#footnote-ref-20)
21. Olivier Costa & Nathalie Brack, How the EU Really Work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19.. [↑](#footnote-ref-21)
22. Olivier Costa & Nathalie Brack, How the EU really Work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22. [↑](#footnote-ref-22)
23. Ibdi. [↑](#footnote-ref-23)
24. 赵贞：《欧洲一体化启动阶段的美国因素分析》，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footnote-ref-24)
25. Olivier Costa & Nathalie Brack, How the EU Really Work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21. [↑](#footnote-ref-25)
26. William V.Wallance & Roger A.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Frances Pinter, London, 1986, pp2. [↑](#footnote-ref-26)
27. 参见：“经济互助委员会”决议：《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1962年6月7日。 [↑](#footnote-ref-27)
28. 参见：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Comecon, http://www3.nd.edu/~jbergstr/DataEIAs2006/FTA5yrData\_files/PDF%20Files/Europe/Comecon%20Document%20(COMECON,%20CEMA,%20CMEA).pdf [↑](#footnote-ref-28)
29. William V. Wallance &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Frances Pinter, London, 1986, pp9. [↑](#footnote-ref-29)
30. “经济互助委员会”最初的宗旨是“联合和协调各会员国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和各成员国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加快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帮助提高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促进成员国劳动成产率不断提高和人民福利的稳定增长。”可参见，John Pinder, Integra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n Europ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C and CMEA, [↑](#footnote-ref-30)
31. Ernst B. Has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63, Vol.17, No.3, The Atlantic Community: Process and Prospects, PP.733-752. [↑](#footnote-ref-31)
32. 王淑娟：《欧盟与经互会的兴亡对区域经济组织发展的启示》，载《东南亚纵横》，2006年8月。 [↑](#footnote-ref-32)
33. 孔凡伟，王强：《经互会与欧盟不同命运之溯源》，载《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5年2月。 [↑](#footnote-ref-33)
34. 维也纳比较经济学研究所出版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统计数据》共出版了八版。由于1991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宣布解散，1990年出版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统计数据（1990年）》成为了该研究所出版的关于“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经济及社会数据的最新版本。 [↑](#footnote-ref-34)
35. 蒙古、古巴和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时间较短，且与核心成员国（主要指东欧各国）相比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小。 [↑](#footnote-ref-35)
36. Ernst B. Has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63, Vol.17, No.3, The Atlantic Community: Process and Prospects, PP.733-752. [↑](#footnote-ref-36)
37. Behr,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Legacies of Imperial Rules? EU Accession Politics Viewed from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13):239-262. [↑](#footnote-ref-37)
38.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footnote-ref-38)
39. Wikipedia, Freedom Hou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edom\_House,2016年11月8日。 [↑](#footnote-ref-39)
40. Ernst Haas, The Uniting Europe of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footnote-ref-40)
41. 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滋格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45页 [↑](#footnote-ref-41)
42. 李少军：《论国际安全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 [↑](#footnote-ref-42)
43. Andrew H.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footnote-ref-43)
44.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02页。 [↑](#footnote-ref-44)
45. Deborach Welch Larson, 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8, No.3, Sep, 1997, P.714. [↑](#footnote-ref-45)
46.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footnote-ref-46)
47. Daniel J. McAllister, “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8, No.1, Feb., 1995, pp.24-59. [↑](#footnote-ref-47)
48.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footnote-ref-48)
49. 海伦 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97页。 [↑](#footnote-ref-49)
50. 王存刚：《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第1-18页。 [↑](#footnote-ref-50)
51. 张海洋：《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研究——历史沿革、机制运行与案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 [↑](#footnote-ref-51)
52. 海伦 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7页。 [↑](#footnote-ref-52)
53. 郭小安：《舆论的寡头化铁律：“沉默的螺旋”理论使用边界的再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5月，第51-65页。 [↑](#footnote-ref-53)
54. 熊壮：《“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四个前沿》，载《国际新闻界》，2011年11月，第43-48页。 [↑](#footnote-ref-54)
55. Jeremy Youde, High Politics, Low Politics and Global Health,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May 11, 2016, p1-14。 [↑](#footnote-ref-55)
56. 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滋格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41页。 [↑](#footnote-ref-56)
57. 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滋格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36页 [↑](#footnote-ref-57)
58.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6-7. [↑](#footnote-ref-58)
59. 杨欣宇：《论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运动新路线的形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5页。 [↑](#footnote-ref-59)
60. European Communitie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Communities>, 2016年12月18日。 [↑](#footnote-ref-60)
61.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 1992, pp.55-76. [↑](#footnote-ref-61)
62. Felix Markham, Napole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66), 257 as quoted in Matthew Zarzeczny, Napoleon’s European Union: The Grand Empir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Kent State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footnote-ref-62)
63. Mark Aspinwall, Preferring Europe: Ideology and National Preference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March 2002, p.81-111. [↑](#footnote-ref-63)
64. 欧洲共同体官方出版局：《欧洲联盟条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11页。 [↑](#footnote-ref-64)
65. “煤钢共同体”不仅仅是通过实现对成员国的煤炭、钢铁的统一管理，使得发生战争而需要调动的能源和资源变为了不可能，进而实现了国家之间的和平。更重要的是，煤炭和钢铁产量丰富的鲁尔地区，一直以来都是西欧国家爆发战争和冲突的火药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两个区域内的强国，历史上有多次围绕这一地区煤炭和钢铁资源的争夺，通过一个超国家机构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有效集中管控，实际上就等于浇灭了法国和德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导火索。参见：John Gillingham, Coal, steel, and the rebirth of Europe (1945-1955): The Germans and French from Ruhr conflict to Economic Commu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ootnote-ref-65)
66. 参见：保罗-亨利 斯巴克，《第54号文件：美国只有欧洲一个伙伴》，1952年2月7日。 [↑](#footnote-ref-66)
67. 参见：罗伯特 舒曼在欧洲委员会协商会议上的讲话，《第四次会议记录》，1950年8月10日。 [↑](#footnote-ref-67)
68. 王绳祖：《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96-203页。 [↑](#footnote-ref-68)
69. 实际上，在“煤钢共同体”的制度设计中，中小国家在投票选举权问题上往往比大国更具优势。这也是实力强大的成员国赢得中小国家信任的重要原因。 [↑](#footnote-ref-69)
70. 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Wiley Press, 1965,pp35. [↑](#footnote-ref-70)
71. Richard L. Merritt and Donald J. Puchala, Western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Public Opinion Studies and Evaluation,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p283-285. [↑](#footnote-ref-71)
72. “富歇计划”认为，“欧洲是法国的欧洲，而不是美国的欧洲”。“富歇计划”具有时代特征和戴高乐鲜明的个人色彩。戴高乐个性独立，反对美国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的控制，并且怀有“大法兰西”的情怀。考虑到戴高乐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性，这个计划并非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合作机制。“富歇计划”实际上充分反映的是戴高乐本人对西欧政治联合的主张。参见：（法）阿尔弗雷德 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 [↑](#footnote-ref-72)
73. “达维农报告”与“富歇计划”在政治合作的原则和宗旨上并没有很大出入，但是两个“欧洲政治一体化”的方案却形成了不同的结果。这就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上述的结论：只有当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信任”关系得到建立和稳固之后，欧洲在“高级政治”方面的合作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突破。 [↑](#footnote-ref-73)
74. Haig Simonian, The Privileged Partnership 1969-1984, Oxford: Clarenkon Press, 1985, pp211. [↑](#footnote-ref-74)
75. 皮埃尔 热贝尔：《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footnote-ref-75)
76. 其中，1958年=100。图表引自：曹洁：《欧共体建立初期的财政体系（1957-1967）》，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 [↑](#footnote-ref-76)
77. A. M 阿格拉：《欧洲共同体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footnote-ref-77)
78. A. M 阿格拉：《欧洲共同体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footnote-ref-78)
79. Willianm V. Walla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Frances Pinter, 1986, P12. [↑](#footnote-ref-79)
80. 索尔 科恩，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5月，第226页 [↑](#footnote-ref-80)
81. 尼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footnote-ref-81)
82. Willianm V. Walla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Frances Pinter, 1986, P12. [↑](#footnote-ref-82)
83. Willianm V. Walla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Frances Pinter, 1986, P11. [↑](#footnote-ref-83)
84.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上海：东方出版社，p331。 [↑](#footnote-ref-84)
85.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认为，以“经济互助委员会”为代表的一系列由斯大林主导下的国际组织，是斯大林企图攫取苏联盟国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方式实际上导致了其盟国对苏联愈发感到不满，并且他声称将会在某个时候解散这些机构。参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东方出版社，p332。 [↑](#footnote-ref-85)
86.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30页。 [↑](#footnote-ref-86)
87. William V. Wallan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P11. [↑](#footnote-ref-87)
88. 甘士杰，《经互会经济一体化的今昔》，载《世界经济研究》（4），第19-23页。 [↑](#footnote-ref-88)
89. William V. Wallan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P64 [↑](#footnote-ref-89)
90. William V. Wallance and Roger A. Clarke, Comecon, trade and the West, P6. [↑](#footnote-ref-90)
91.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719页。 [↑](#footnote-ref-91)
92. 2015年开始，由于中东地区的储蓄战乱，大量中东难民流离失所。2015年底，经由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难民数量已经超过了90万，这一数字比2014年高出了近一倍。庞大的难民数量涌入欧洲，对欧洲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得原本因为“欧债危机”冲击的欧洲经济社会备受打击。在这和个背景下，一些“欧盟”成员成员国宣布不再受来自于中东的难民，并拒绝执行“欧盟”的有关决议。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离“欧盟”的公投，“脱欧派”以微弱多数赢得公投结果，这使得“欧洲一体化”遭到重创。 [↑](#footnote-ref-92)
93. 参见：The World Bank-IBID IDA,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2016年11月7日。 [↑](#footnote-ref-93)
94. 参见：The World Bank-IBID IDA,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2016年11月7日。“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分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缺乏捷克斯洛伐克在“天鹅绒革命”之前的统计数据。同样的，苏联与德国（包括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数据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也没有被收录。 [↑](#footnote-ref-94)
95.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s Studies, COMECON Data 1990,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1. [↑](#footnote-ref-95)
96. 参见：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1980, 1980。其中颜色越深，表明公民的自由权越受到限制。 [↑](#footnote-ref-96)
97. National Master,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info/stats/Religion/Religions>, 2016年11月8日. [↑](#footnote-ref-97)
98. 同上。“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但宗教信仰的分布不会因地理上的隔绝，以及短期内的时间推移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笔者将斯洛伐克和即可共和国都放入该图表中进行比较。 [↑](#footnote-ref-98)
99. European Communities,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Communities>, 2016年12月18日。其中绿色所显示的国家是“欧洲共同体”的创始成员国，蓝色所显示的国家是后来加入“欧共体”的成员国。 [↑](#footnote-ref-99)
100. 图片资料来自：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mecon.svg 。其中，深红色区域为“经济互助委员会”正式成员国；黄色部分为“经济互助委员会”观察员国。 [↑](#footnote-ref-100)